論　著

從「造化機論」到「培種之道」：通俗性科學在清末中國社會的傳播

唐　權*

摘　要

在近代以來攝取西洋文明的浪潮中，性科學作為改造國民和社會所必需的新知識，得到了中國知識人的熱烈擁抱。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以介紹性知識為主題的著作在中文世界陸續登場，並創造了一個持續數年之久的出版風潮。本文主要以清末的出版物為研究對象，一方面通過追尋知識傳播的來龍去脈並考察相關文本的內容，探討清末知識人所接受的性知識集合——我稱之為「通俗性科學」——究竟有著怎樣的特色。另一方面，我還通過分析圍繞

* 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這些性知識所產生的各類話語，考察性科學在近代中國社會中的影響。本論文主要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主要考察甲午戰爭以前來華傳教士所著解剖學著作中涉及的性知識。我特別指出的一點是，這些知識儘管沒有給當時的中國讀書人帶來精神上的衝擊，但卻在鄰國日本的知識界掀起波瀾。第二部分把眼光移向明治時期的日本社會，探討這一時期曾風靡一時的「造化機論」，它是中國通俗性科學的源頭。除了介紹千葉繁譯述《造化機論》一書的內容，同時也考察了屬於造化機論中的特有認知，如情慾論以及電氣説等，以及圍繞造化機論的各類不同話語的存在。第三部分考察造化機論進入中國社會的具體過程。在保種強種的口號聲中，造化機論被清末知識人幻視為「物理學之源」、「心靈學之本」，與其他學校教育的著作混在一起，介紹給國人。在全面考察造化機論被清末知識人接受的幾種方式——日文版、日文版的中譯本、日本人的漢文編纂本，以及中國人的編纂本——的基礎上，我還分析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幾部著作的各自特色，如法烏羅《男女交合新論》、森田峻太郎《傳種改良問答》等。第四部分以通俗性科學中特有的認知——電氣説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中國社會流布的情形。電氣説不但在清末被廣泛接受，而且其影響力持續到民國時期，最終在 1920 年代後期張競生的文章裡達到高潮。通俗性科學曾被中國知識人廣泛接受，可以説是近代中國新知識建構過程中不該被遺忘的一頁。

關鍵詞：通俗性科學、造化機論、電氣説

引　言

近代以來流布於中國社會中的性知識，就內容而言，大致可分爲兩類：一爲本土的（或已經本土化的）性愛之術，記載於佛道兩教的典籍和中醫著作之中；一爲新舶來的性科學，主要見於一些西學書籍。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期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在性領域所出現的一個重大變化，簡言之就是後者作爲理解人的奧祕及改良社會的理論武器，被積極引進和廣泛傳播，最終取代前者而成爲知識界的主流話語。借用文學研究者彭小妍的表述，不妨說近代中國知識人曾經發動過一場「性啓蒙運動」。[1] 本文試圖探求的問題是，這場運動所帶來的新知識內容究竟爲何？

概觀中文世界裡的性話語，不難發現無論是內容還是表達方式，皆因時期不同而呈現出極大差異。而發生變化最顯著的時期，首先出現在二十世紀初。如李伯元(1867-1906)在《南亭四話》中記錄一則逸話云：

> 浙江某文社，多課詩鐘。一日有滑稽子，以某相與婦人生殖器為題，其拔居首選者一聯云：「一國盡稱和事老，大家俱是過來人」。[2]

「生殖器」一詞是舶來的和製漢語，清末時被稱爲新名詞。

---

1 彭小妍，〈性啓蒙與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張競生與五四的色慾小說〉，《文藝理論研究》，1995 年第 4 期，頁 47。關於近代中國新知識建構的概括性論述，可參見沙培德、張哲嘉，〈導言：現代中國知識：全球化與在地化〉，收入沙培德、張哲嘉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19。

2 李伯元著，薛正興校點，〈南亭四話〉，收入《李伯元全集 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219。

一群文人興致勃勃以之爲題，舉行詩會，在今天雖不免令人驚詫，但當時卻屬趨新應時之舉，甚至有報紙也在推波助瀾。[3] 此則逸聞透露的信息是，清末不少讀書人對於性的近代語彙已經毫不陌生。而李伯元不帶道德譴責色彩的平淡筆調，亦反映出時人對於舶來的性知識，持有相當開放和寬容的態度。

「生殖器」作爲流行新語闖入漢詩園地，不妨看作是西方的近代知識經由日本，被大規模介紹給國人這一時代浪潮中泛起的一朵浪花。清末知識人所熱烈擁抱的，當然並不僅僅是「生殖器」一個詞，還包括它背後的龐大知識集合體。張仲民近年來對晚清出版文化的研究顯示，涉及「生殖醫學」這一主題的書籍在清末出現過不少。張氏通過爬梳報刊文獻中的廣告，已整理出包括五十餘種書名的「生殖醫學書籍書目」，令當時的性話語群露出了冰山一角。[4] 這些出版物的主旨，多是向讀者介紹和普及今天被劃歸爲「性」這一領域的各類相關知識，其內容龐大而駁雜。西方的性科學在 1870 年代首先被介紹到日本，明治時期一般稱「造化機論」，而現代日本學者則多以「開化性科學」（開化セクソロジー）或「通俗性科學」（通俗セクソロジー）稱之，以區別於後來大正時期流行的「通俗性慾學」。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人將前者引進國內，數年間風靡一時。就書籍的出版體裁而言，清末的性科學書與其日本前輩一樣，皆爲面向一般讀者的通

3 光緒三十年(1904)七月初一刊《同文滬報》亦同樣以「生殖器」為題，公開向讀者徵求詩鐘聯語。見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頁 245。

4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頁 184-188。

俗啓蒙讀物。本文所關注的對象，正是這些清末的出版物，我把其中的性知識集合統稱爲「通俗性科學」。

關於西方性科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民國前期周作人(1885-1967)、張競生(1888-1970)等人的介紹和提倡，以及《性史》(1926)出版後國內論壇及圖書市場的熱鬧喧囂，是廣爲周知的事實。相比之下，在李伯元生活的時代，國人接受性科學洗禮的那一幕，在今天可以說已被完全遺忘。箇中的原由，民國知識人的緘口默言是不可忽視的一點。周、張等人對於斯妥布思女士（Mary Carmichael Stopes, 1880-1958，或譯司潑托夫人）《結婚的愛》(*Married Love*)、藹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性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x*)等西文著作雖然交口稱讚，但對屬於前一個時代、帶有強烈日本色彩的著作群卻絕不提及，彷彿後者從來不曾存在。這種有意的漠視，到底是因爲他們對清末流入的通俗性科學持徹底否定態度的緣故，還是因爲同時期排日風潮的影響，尚有討論餘地（如本文第四節所示，張競生對性的理解就頗似清末人，但他本人卻不向讀者交代這一點）。

導致通俗性科學被後世遺忘的另一個、或許是更主要的原因，應和「性」這個漢字符號有關。因爲在清末文獻中，完全看不到這個字作爲 sex——即在生物學上是指基於身體的雌雄區分，在日常生活中則一般被理解爲與性行爲相關的人的行動或是行爲的集合——對譯語的使用實例。當時的流行語中，代替「性」出場的大致有「淫」、「生殖」、「色情」、「男女交合」等語彙。「性科學」一詞自然也未誕生，「傳種改良」或是「婚姻進化」，以及本文題目中出現的「培種之道」等字眼才是帶有時代色彩的表達。同時，介紹通俗

性科學知識的出版物雖多，但在清末的新學書目中，它們並沒有被劃爲單獨一科，而是多被歸類於「全體學」或「生理學」的欄目。總之，無論是語言表達還是學科定位，清末人對性科學的理解和後世之間有一條深深的鴻溝。

回顧漢字「性」與sex之間互譯關係之確立，可以說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最早把二者聯繫在一起的，是幕末時期的日本學者。據齊藤光考證，堀達之助(1823-1894)所編的《英和對譯袖珍辭書》(1862)一書中，sex已經被解釋爲「種族、性、同門之人」。不過在其後的很長時期裡，二者在日語中的關係並不固定，sex經常被譯爲「色」或是「淫」，而「性」則有時也作爲nature的對譯語被使用（如以「性法」翻譯Natural Law）。直到 1900 年前後，意爲sex的「性」才開始在各類作品中大量出現，而這種對應關係眞正實現最終的安定化和規範化，則要等到 1920 年代以後。齊藤氏還指出，「性」字本來有「本質」、「本性」、「心靈」等正面含義，這使得它在作爲sex的對譯語時，也自然地披上了一層「科學」和「客觀」的色彩。該字最終被大多數日本人接受，在各類著作尤其是辭書中替代了「色」、「淫」等其他漢字譯語。這一過程，被齊藤氏稱爲「性」的「文化的標準化」。[5]

中文裡「性」作爲sex對譯語的用法，無疑來自日語。而「性」的「文化的標準化」現象，在中國大致出現於 1910 年代末期。如周作人在一篇介紹西方性科學著作的文章〈愛

[5] 斉藤光，〈「性慾」の文化的標準化〉，《京都精華大学紀要》，号 6（1994 年 1 月），頁 161；斉藤光，〈《性科學・性教育編》解說〉，收入斉藤光編，《性と生殖の人権問題資料集成》（東京：不二出版，2000），卷 27，頁 2-4。

的成年〉（1918 年）中，已經使用了諸如「兩性問題」、「性的進化」、「性慾」等詞彙，且沒有加任何特別解釋。[6] 1920 年代初期，留法歸來的張競生作爲哲學教授在北大講學時，曾把「從科學上研究生殖器如何得到最美妙的觸覺，與心理上如何得到交媾時的樂趣」的學問稱爲「閨房術」，其課堂講義——即風行一時的《美的人生觀》（1925 年初版）——中還沒有使用「性」字。[7] 但到了 1926 年初，當他在雜誌上撰文，號召讀者寫出個人「性史」的時候，要求投稿者不但要介紹自己的「性量大小」，還要把交媾對象的「性慾狀況、性好、性量、性趣等，請代爲詳細寫出來」，以作爲「『性學問』的材料」。[8] 張氏對「性」字的使用表現出強烈偏好，這一方面可看作是他爲了增強自己文章的科學色彩而採取的一種策略；另一方面，也不妨說從這時起，「性」概念的使用已經不局限於留日歸來者。他所說的「性學問」，應和「閨房術」一樣都應當是sexology或sexual science的早期譯例。這個詞民國時又被簡化爲「性學」，一直使用到今天。

概言之，近代中國有兩代知識人——津津樂道「生殖器」的清末人和呼籲「『性慾是一切』，纔是我們眞正的學問」的民國人[9] ——曾經先後熱烈擁抱過西方的性科學。這兩代

[6] 周作人，〈愛的成年〉，原載於《新青年》，卷 5 號 4（1918 年 10 月 15 日），轉引自周作人著文，鐘叔河編訂，《知堂書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上冊，頁 326-328。

[7] 張競生，《美的人生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41-42。

[8] 張競生，〈一個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優種社」同人啟事〉，《京報副刊》（北京），號 375，1926 年 1 月 5 日，頁 14。

[9] 張競生，〈介紹一個大問題——男女關係〉，《京報副刊》，號 375，頁 9。

人所接受的性知識各自包含了哪些內容？它們之間哪些地方有連續性？哪些地方又存在斷裂？迄今爲止的研究中，還沒有人嘗試給這些問題提供一個答案。[10]

本文的焦點集中於清末，具體來說，就是 1900 年前後的數年間。我嘗試以當時的出版物爲線索，去接近隱藏在

---

[10] 關於近代中國「性」領域的概述性論述，有劉達臨，《二十世紀中國性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00）以及 Susan Mann 的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日文版：小浜正子・Linda Grove 監譯，《性からよむ中国史——男女・隔離纏足・同性愛》（東京：平凡社，2015）〕。前者為社會學者的著作，較少實證性的歷史考察。後者從女性史立場出發，企圖全面展示近代中國的性／性別系統，特別深入討論了女性隔離規範的消滅過程，堪稱野心之作。不過兩書均未觸及「性」概念在中文世界如何成立，以及清末中日之間圍繞性科學的文化傳播。關於西方性科學如何被國人接受的問題，黃克武、彭小妍、李貞德等臺灣學者已經探討過一些個案。黃氏通過分析民國前期《申報》的醫藥廣告，指出當時存在「性的病因論」的認知，即把縱慾過度所導致的精液浪費視為諸病之源。見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1988 年 12 月），下冊，頁 162-170〕；彭氏圍繞張競生有一系列研究，其中涉及性科學的，除了前述〈性啓蒙與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張競生與五四的色慾小說〉，尚有以下幾篇論文值得參考。關於民國知識界性慾話語的分析，有〈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慾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頁 77-96；〈張競生的性美學烏托邦：情感教育與女性治國〉，收入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兩篇。關於民國知識人的性知識來源，有〈張競生的《性史》：色情還是性學？〉（《讀書》，2005 年第 8 期，頁 156-161）。李氏的研究，則以民國時期生理衛生教科書為對象，分析存在於其中的文化與社會的力學關係，如性與生殖的拉鋸與消長、國家權力與作者和書局之間若即若離的競合、教本的多樣性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男女性差。見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祝平一主編，《衛生與醫療》（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以上三氏考察的時段，均為民國前期。

「生殖器」話語背後的知識世界。這項作業之所以成立，主要得益於兩方面的先行研究：一是大陸學者在書誌學和文獻整理方面取得的成績。除了前述「生殖醫學書籍書目」提供了按圖索驥的指南，一些塵封已久的著作如楊翥著《吾妻鏡》（光緒二十七年序），近年來也被發掘出來並得到正面評價。[11] 二是日本學者在本國性科學史領域取得的豐碩成果。尤其是關於明治時期「造化機論」的研究，自木本至的名著《手淫和日本人》（《オナニーと日本人》，1976）問世以來，上野千鶴子、齊藤光、赤川學等當代學者皆各有貢獻。他們整理出版的史料集，以及所澄清的史實和提出的創見（詳見第二節），可以說奠定了東亞地區性科學接受史研究的基礎。

以下的論述由四部分構成。各部分的考察重點，分別是甲午戰爭以前直接自西方傳入的性知識、明治日本的「造化機論」、清末流行的通俗性科學著作、作爲性愛基本原理的「電氣說」。由於相關資料難以搜盡，以及個人知識範圍的局限，此項研究僅僅算得上是對通俗性科學傳播史的輪廓所作的一個粗略勾勒。我關注的層面一方面在於發掘中日兩國在知識交流領域中被埋沒已久的史實，同時我也希望借助這些史實去打開一扇窗口，以探索近代中國人精神世界中的某些側面，其中自然包含那些曾熱衷於拿「生殖器」吟詩聯句的騷人墨客。

---

11 王宝平，〈中国における『吾妻鏡』の流布と伝播〉，《古文書研究》号 55(2002)，頁 85-86；張仲民，〈另類的論述——楊翥《吾妻鏡》簡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195-210。

一、通俗性科學傳來前史

英文中sexology一詞的初出時間相當晚，大致是在 1860 年代。[12] 不過，在十九世紀的性科學裡面，實際上包含這大量淵源古老的知識。其中最基本和主要的，是關於男女生殖器官的結構與功能的解剖學知識，以及涉及性的病理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最早進入中國的時期，並不是清末，因爲當早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們，嘗試向中國人介紹西方學術時，就已經提及它們。所以在考察清末中日間圍繞通俗性科學的知識交流之前，有必要首先回顧更早時期的情形。

關於人體解剖知識的介紹，最早見於明末清初來華天主教傳教士的性學著作（此處的「性學」，指「費西伽」(physica) 一門，即格物之學）。其中涉及解剖學的著作，主要有艾儒略(Giulio Alenis, 1582-1649)著《性學觕述》（1623 年序）、鄧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 1576-1630)著《泰西人身說概》（1634 年以後）、由鄧玉函、羅雅谷(Jacobus Rho, 1593-1638)和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 1599-1654)三人合著《人身圖說》（抄本）等漢文著作，以及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應康熙皇帝的要求，自 1698 年起歷時 5 年以滿文編譯的《欽定格體全錄》。這些著作中的知識，主要反映了歐洲十六世紀以來在解剖學上取得的成果。[13] 就其中涉及男

---

[12] 赤川学，《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歴史社会学》（東京：勁草社，1996），頁 397。

[13] 關於漢文解剖學書與西方著作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國內相關研究的綜述，可參見牛亞華，〈《泰西人身說概論》與《人身圖說》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卷 25 期 1(2006)，頁 50-65。

女生殖系統的論述而言，我想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是專門用語的翻譯。由於中國和西方在身體觀和知識體系上的巨大差異，如何傳達中文裡不曾有過的各類概念與認知，是首先必須面對的挑戰。傳教士們苦鬥的結果，是一系列全新用語的發明。如《人身圖說》中有「男女內外陰及睪丸並血脈二絡」、「論睪丸曲折之絡與激發之絡」、「論女人子宮」等許多章節，皆詳論生殖器官的構造和功能。據范行準在《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中的研究，這些章節中常常出現的「質具」一詞，實指男子的精液或是女子的經血；與之相關的「質具絡」則爲生殖器動脈和靜脈之總稱；又有「激發之絡」一詞，指的是男子之輸精管，或是女子之輸卵管；至於「曲折之絡」，指的是男子之副睪丸。說到「睪丸」，則不但男子有，女子亦有；所謂「女子睪丸」乃是對卵巢的稱呼。而這一系列語彙背後包含著一個理念，即男女在生殖器官上並無本質不同。[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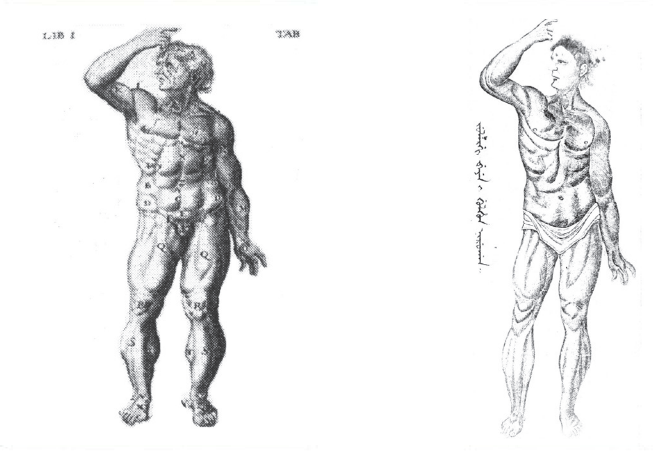
傳教士的新語發明，借用赤川學的分析框架，可以稱爲知識「言語化」的嘗試。[15] 如果要普及一種知識，則需要在

14 范行準著，牛亞華校註，《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97，頁 114-116。另外，關於這個問題，董少新亦有詳細分析，參見《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44-354。

15 赤川学把涉及性的知識向社會傳播的過程分為四個步驟：一是言語化，即一種知識經過少數專家的議論，通過一些專業術語的發明而令其得以成立的過程；二是通俗化，即這些專業術語通過雜誌或是文學等媒體，向一般人傳播的過程；三是社會問題化，即新知識在被實踐的過程中與其相關的事項，作為社會問題顯現；第四是國語化，即已經被通俗化的知識作為正統的國民言語，被記錄進各類辭書的過程。參見赤川学，《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歴史社会学》，頁 56。

「言語化」的基礎上進一步作「通俗化」的努力。對於後者，早期來華傳教士們似乎沒有顯示出興趣。因此上述知識儘管進入了中文世界，但對於明清時期的讀書人來說，其內容之艱澀難懂，幾無異於鳥言侏離。嘉道年間安徽人俞正燮(1775-1840)是少有對《人身圖說》做出正面回應的學者。他曾略帶誇張地感歎說：「此書在中國二百年矣，未有能讀之者」。沒有讀懂的人群中當然也包括俞正燮本人，因為在研讀完《人身圖說》之後，他竟然得出了「中土人睪丸二，彼土睪丸四」的結論。[16]

圖一　男子人體圖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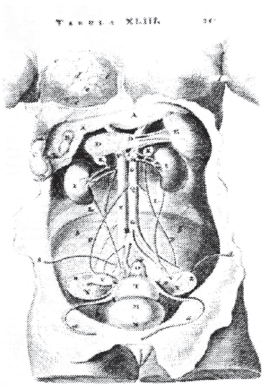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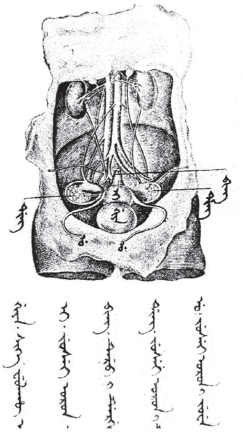
左：Caspar Bauhin (1560-1624)著《解剖劇場》（*Caspari Bauhini Basileensis Theatrum anatomicum*, 1605，國際日本文化中心野間文庫藏），p. 9；右：巴多明，《格體全錄》〔1698-1703 年成立，轉引自 *The Manchu Anatomy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 (Taipei: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1981)〕, p. 2。

16　俞針對西方解剖學的評論，見其所著《癸巳類稿》。相關內容轉引自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頁 346。

明末清初西學書籍的另一個特色，是傳教士們對「性」的表現極爲謹愼。也許是懼怕得到「誨淫」的壞名聲，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沒有插入任何一幅表現男女外陰部的圖解。不但插圖頗爲粗陋的漢文著作如此，即使是那部滿文的《欽定格體全錄》也不例外。後者包含數十幅精美插圖，皆取自同時代歐洲的解剖學著作。對照兩邊的插圖可知，巴多明在編譯過程中，對於原圖作了一系列大膽改動。如原本是正面裸體的男子，其腰間被加上了一條惹眼的遮羞布（圖一）；而對於女子身體正面的描繪，則用拉長皮膚的辦法來悄悄掩蓋外陰部（圖二）。與之相應的是，文字說明也同樣顯得小心翼翼。因爲對於男女外陰各個部位名稱的詳細解

圖二　女子人體圖之比較





左：Thomas Bartholin (1616-1680)著《人體解剖學》（Thomæ Bartholini Anatome ex omnium veterum recentiorumque observationibus, 1673；國際日本文化中心野間文庫藏），p. 251。右：巴多明，《格體全錄》，轉引自 *The Manchu Anatomy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 p. 156.

說，在所有書籍中都是找不到的。據渡邊純成介紹，《欽定定格體全錄》一書中凡指男子陰莖之處，皆用滿語ergen——其意爲「生命力」——來委婉表達。[17]

關於明末清初解剖學在中國社會的傳播，還有一點需要提及，即內容上最爲充實的兩部著作——《人身圖說》和《欽定格體全錄》，實際上都不曾出版過，而僅以抄本的形式小範圍流傳。所以這兩部著作的讀者群，無疑極爲有限。從以上三點——傳教士們對於解剖學知識通俗化努力之闕如、對於性表現之謹慎迴避和解剖書傳播範圍之狹窄——不難想像，明清之際來華教傳教士所帶來的性知識，幾乎沒有在中國社會掀起任何波瀾就被冷落在旁了。

如果說《人身圖說》等西學著作是性知識傳播的第一波，那麼第二波的傳播也同樣依附於漢譯解剖學書籍。不過後者的編譯者，已經變成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來華的新教醫學傳教士。在 1850 年之後的近半個世紀裡，他們共留下了十種左右以「全體」命名的解剖學著作。[18] 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的《全體新論》(1851)、柯爲良(Dauphin William Osgood, 1845-1880)著《全體闡微》(1881)，[19] 以及德貞(John Dudgen, 1837-1901)著《全體通論》(1886)等書。在這類著作中，出版時期既早且在中國社會引起相當反響者，則首推《全體新論》。

作爲一部企圖利用近代醫學來改變中國人的傳統觀念

---

17 渡辺純成，〈満州語医学書『格体全録』について〉，《満族史研究》，号 4（2005 年 6 月），頁 50、54。

18 高晞，《德貞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325。

19 柯為良，《全體闡微》〔福州聖教醫館，光緒七年(1882)〕。

和信仰的著作，合信在《全體新論》中用了五節的篇幅——分別題爲〈外腎經〉、〈陽精論〉、〈陰經〉、〈胎論〉、〈月水論〉——來介紹人的生殖系統。也許是從前輩傳教士著作的失敗中接受了教訓，合信的文章十分注重語言的通俗化和表述的形象化。如「外腎經」中介紹睪丸的構造與功能云。

> 外腎俗曰卵子，粵東土語曰春子。為生精之府，延嗣之經。閹之割之，音容頓改，生育之權絕矣。位懸兩胯當中，雙垂腎囊之內。腎囊者……（下略）

在接下來的具體說明中，合信大量使用比喻，以追求說明對象的可視化。如說男子的「卵子形如鳥蛋而扁」，其內部則「間分十餘層，仿似葵扇之紋」，至於精管，則是「狀若行蛇」等等，皆是以文學性的表現來加強文章的通俗性。[20] 對於〈陰經〉即女子生殖系統的說明，合信也同樣是不惜多費筆墨在行文中植入俗語和比喻。如解釋女子初次與男子交合時，「膜破微有血出，故俗曰破身」。在介紹子宮時，說其「狀若番茄，頗似葫蘆上截」、而「子核」（卵巢）則是「形如雀卵」等等。在追求知識的通俗易懂方面，合信可以說是煞費苦心。

《全體新論》帶給中國讀者的解剖知識，除了合信在華友陳修堂幫助下創造的一系列全新術語，就性知識的內容而言，我認爲有兩個地方值得注意：一是他說的「陽精」或

---

20 合信，《全體新論》〔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越智藏版，安政 4 年(1857)刊〕，坤冊，頁 27。此日本刊本為廣州惠愛書局刊本的翻刻，與原中國刊本相比，少「造化論」一節。又，在海山仙館叢書版（咸豐辛亥刊）中，「粵東土語曰春子」被置換為「古人亦呼為睪丸」。

「精」，已經不同於《人身圖說》中的「質具」，而是指通過顯微鏡才能看到的「狀若蝌蚪而尾長游行甚疾」的「活物」，即精子。與此相應，該書也介紹了女子體內的「精珠」，即今天所說的卵子。合信在這裡告訴中國讀者的，不必說是直到今天還在通用的生理常識，即精子卵子結合的成孕受胎之理。[21]

《全體新論》帶給中國讀者的另一個新知識，是關於縱慾過度、手淫及性病。合信在〈陽精論〉一節中有如下記述：

> 夫精者，化生甚難，耗失甚易。少年血氣未定，百體未堅，若縱情恣慾，輕則有虛弱之憂，重則有夭殤之患。戒之在色，養身莫善於寡欲也。若手淫自洩，傷身更甚，每有青盲聾懵之症。至於擁妓宿娼，花柳之害尤酷。傷殘身體，毒及妻孥。不知自愛者，誰為惜之。[22]

這段話中的「少年血氣未定」和「戒之在色」出自《論語》，「養身莫善於寡欲也」出自《孟子》。對清代讀書人來說，皆是再熟悉不過的聖人語錄。但是，合信爲這些聖人語錄所提供的解說，特別是強調手淫之害的說明方式，卻不是中國式的。事實上「手淫」二字未見於比《全體新論》更早的中文文獻，我斷定它應該是合信專門爲onanism或masturbation

---

21 〈陰經〉一節中有論及成孕與受胎，其文云：「凡夫婦交媾，男精洩入子宮，透於子管。子管即把罩子核，子核感動，精珠迸裂。陰精與陽精交會，自子管之尾而入。在管內漸結薄衣為胚珠，是為成孕。由是子管漸大，胚珠漸行，數日之內行至子宮。子宮接之，血入漸多，預生新膜，又生膠粒以塞子宮之口，是謂受胎。」合信，《全體新論》，坤冊，頁 29b。

22 合信，《全體新論》，坤冊，頁 28a-b。

所苦心鑄造的對譯語。順帶一提，有一本題爲《色香歌》的中日辭書，與《全體新論》的成書年代相距大約不遠。這部辭書作爲江戶後期日本人編纂的漢語學習教材，其特色之一是收入了許多涉及性器官和性行爲的漢語通俗語彙。其中有一個俚詞是「五姐作緣」，被解釋爲「弄陰莖之事」。中國人在接受語意凝重的「手淫」之前，這種輕佻和帶玩笑含義的語彙大約才是對自慰行爲的一般稱呼。[23]

上面這段引文的知識背景，當是彼時風靡歐洲的、以手淫爲諸病之源的醫學觀念。十八世紀以來，由於一本題爲《俄南之罪》(*Onania*, 1716)的匿名暢銷小冊子之問世，再加上號稱「萊芒湖畔的名醫希波克拉底」的瑞士醫生提索(Samuel August Tissot, 1728-1797)旁徵博引的論證，手淫在歐洲成爲令人談虎色變的恐怖病症。提索撰寫了一部探討手淫病因的名著，即《論俄南之罪》（*L'Onanisme*，法文版初版 1760 年）。這部以嚴肅科學著作面貌出現的著作，被認爲是近代以來的第一部性科學專著。合信所述「夫精者，化生甚難，耗失甚易」，令人聯想到提索的體液理論。這種理論把人體內的體液按其重要性排序，而精液作爲人體之精華，則位於體液排行榜的最頂端。借用提索的名言，就是「失去一盎司精液，相當於失去四十盎司血液」。另外，「手淫自洩、傷身更甚，每有青盲聾聵之症」的看法，同樣也符合當時歐洲人的常識。按照讓·斯丹熱(Jean Stengers)在《自慰：一種巨大恐懼的歷史》一書中列出的清單，十八至十九世紀時歐洲醫生認爲因手淫所導致的諸多病症之中，即包括感官

23 作者不明，《色香歌》，收入古典研究會編，長澤規矩也解題，《唐人辭書類集》（東京：汲古書院，1971），第 4 集，頁 111。

系統方面的病症，如視力和聽力的變弱，或是完全失去視覺和聽覺，同時還包括神經系統方面的病症，如歇斯底里、痙攣、癡呆、低能和精神錯亂等等。[24] 這些觀點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後，始有學者指摘其爲無稽之談。而在合信的時代，它們是被毫不懷疑地當作眞知灼見來信奉的。

《全體新論》初版的發行量，據說爲 1,200 部。與合信有過直接交往的王韜(1828-1897)在其日記中寫道，這部著作問世之後，一度出現了「遠近翕然稱之，購者不憚重價」的情形。在合信去世後創作的〈英醫合信氏傳〉中，王韜還發出感歎云：「噫。合信氏雖寂寞於當時，必顯揚於身後。其所著五書，今已風行海內，不脛而走，沒世之稱可爲操券也已。」扣除文字中的溢美成分，《全體新論》自問世後被許多中國人讀過，這大概是不爭的事實。[25]

不過，就該書中的性知識而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給同時代的中國讀者帶來衝擊，卻依然值得懷疑。原來男子「外

---

24 關於 Onania，參見 Michael Stolberg 著，斉藤光譯，〈自瀆道德改良性病商売——『オナニア』(1716)の諸源泉とその歴史的文脈に関する考察（上）〉，收入井上章一編，《性欲の研究　エロティック・アジア》（東京：平凡社，2013），頁 149-154。關於提索《論俄南之罪》一書中的體液理論，以及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的手淫認識，參見讓・斯丹熱(Jean Stengers)與安娜・凡・內克(Anne Van Neck)合著，巫靜譯，《自慰：一種巨大恐懼的歷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9），頁 17-19、89-102。

25 關於《全體新論》在清代的社會影響，可參見吉田寅的詳細討論。吉田寅，〈中国キリスト教初期医療伝道史研究——ホブソン著中国語医学書の一考察——〉，《立正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号 12（1996 年 3 月），頁 97-100；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11；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278-279。

腎經」和女子「陰經」的構造是如此奧妙，原來人乃是從「陽精」、「精珠」之結合而來，原來手淫竟然是可使人變盲變聾和變傻的惡習……，諸如此類的驚歎和感想，也許是合信極其渴望聽到的。但在鴉片戰爭以後，最早睜眼看世界的那一代中國讀書人所留下的文字紀錄中，我還沒有找到一句。爲了讓中國人接受西方的解剖學知識，醫學傳教士們在知識的言語化及通俗化方面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但卻未獲得回應。即便是對西學有強烈關心並且不吝把最大讚辭送給合信的王韜本人，也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回應《全體新論》中的性知識。自負爲風流才子的他，其實並非對性知識不感興趣，但其留下的唯一相關著作，卻只是一冊未刊的《璇閨祕戲方》。該書爲春方媚藥集，其中記錄的都是作者認爲對追求「老陰還童」或是「大壯元陽」有靈驗效果的各類處方。[26] 這些處方展示的，不必說依舊是中醫和方術的世界，而與近代生理學無緣。

晚清第一代啓蒙者並未對西書中的性知識感到興趣，這一現象也許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解釋：第一，這些知識幾乎完全依附於解剖學著作。由於解剖學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嚴重衝突，有許多清人——哪怕像薛福成(1838-1894)那樣的開明之士——是從根本上對其持否定態度的。他們或斥之爲「胔骼堆中、殺人場上」的醫道，或把人體骨骼標本的製作看成是無比「慘酷之事」。[27] 第二，記錄這些知識的解剖學

[26] 王韜，《璇閨祕戲方》手稿，收入《苕華廬日記》，冊 2，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檔名：wt-c-08.doc。感謝潘光哲教授慷慨提供該手稿的數據。

[27] 清人陸懋修斥王清任《醫林改錯》云：「是教人於胔骼堆中，殺人場上學醫道矣」。轉引自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

書常常帶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解剖學在西方的發展與基督教息息相關，而傳教士們在著述時也往往並不掩蓋這一點。如《全體新論》中〈靈魂妙用論〉、〈造化論〉等章節的存在，即是最好的註腳。對於固守儒家教誨的讀書人來說，對洋教的反感或許會阻礙其吸收解剖學知識。第三，傳教士們所傳授的性知識範圍，簡言之就是只包括兩部分，即作爲生殖的性和性的病理，而完全不涉及性愛原理和應用技術。換句話說，就是說缺少了快樂的性這一部分，因此這些新知識並不能滿足讀者的全部需求。王韜一方面盛讚合信普及西醫知識的功績，但另一方面依然醉心於春藥祕方的收集，其理由或許正在於此。

相對於王韜等人的漠視，同時代的日本人存在著完全不同的反應。眾所週知，合信五書問世後，在極短時間內被輸出到日本。儘管受到漢方醫和佛教僧侶的嚴厲攻擊，這些著作在蘭學者中間卻極受好評。如廣瀨元周(1833-1885)就把這五部著作評爲內容上「皆取確證，爲看破漢醫鑿空張虛之說，論理卓絕，述漢人之所未云」的快心之作。[28] 以《全體新論》爲例，其普及速度之快，可以說遠超中國。具體來說，自安政四年(1857)即由二書堂出版了和刻本，明治七年(1874)更出現了題爲《全體新論譯解》的兩種同名和譯本，分別刊行於東京和大阪。四年之後，又出現了面向一般讀者的普及

頁 311。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一書中，記錄其參觀倫敦博物館人體骨骼標本後的感想云：「拙哉西醫。中國之良醫，亦能推動人之竅穴脈絡，而百無一失。然不必親驗死人，亦未嘗為此慘酷之事也。忍哉西人也。」轉引自高晞，《德貞傳》，頁 354。

28 合信原著，廣瀨元周和解，《婦嬰新說和解》（京都：石田忠兵衛，1874），「題言」。

版，即由松井惟利翻譯的《通俗全體新論》(1878)。至於合信的其他幾種著作，也同樣都是各有和刻本和譯解本刊行。[29] 綜上所述，從 1850 年代末到 1870 年代前期的十餘年間，日本迎來了堪稱「合信五書熱」的時代。

日本自江戶中期即開始積極吸收西洋醫學知識，並最終發展出一套與漢學和國學鼎足而立的新學術體系，即蘭學。接受解剖學知識的土壤，可以說早已存在於日本社會。事實上，幕末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對於合信著作的探討相當積極，除了對其中的專門名詞與日本人自己發明的術語進行同定作業（例如，闡明「子管」與「喇叭管」、「子核」與「卵巢」之間的對應關係）之外，也包括討論〈陽精論〉中出現的手淫有害論。不過，手淫對於明治初期的大多數日本人來說，還是一個陌生概念。在出版於大阪的《全體新論譯解》(1874)中，作者高木熬叔敵依據《左傳》的記載，把「手淫」二字判讀爲「宣淫」之誤。[30]

高木留給後世的著作，大多是《隨園文萃》、《修身要言》之類的漢學書，可知其人本非蘭學者。如果不是因爲墨守中國古典，或者事先對蘭學著作有所涉獵的話，他其實能夠找到手淫的含義。因爲在同時期的蘭醫中，如緒方洪庵(1810-1863)、惟準(1842-1909)父子，就已經多次使用過該詞。[31] 一個與近代醫學無緣的漢學家，卻興致勃勃地參與解

29 關於合信五書在日本的翻譯出版情況，吉田寅有十分詳實的討論。吉田寅，〈中国キリスト教初期医療伝道史研究——ホブソン著中国語医学書の一考察——〉，《立正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号 12，頁 100-108。

30 高木熬叔敵，《全體新論譯解》（大阪：文榮堂・寶文軒，1874），頁 74-75。

31 赤川学，《明治の「性典」を作った男　謎の医学者・千葉繁を追う》

剖書的翻譯，乃至對手淫作門外漢式的解說，這件事卻正好反映了明治時期日本人對西洋性知識的關注。不難想像，以介紹性知識爲主的西學書籍進入知識人視野的時機，在 1870 年代的日本已經先於中國成熟了。

二、明治日本的造化機論

性科學正式輸入日本的標誌，一般認爲是明治八年(1875)《造化機論》乾坤兩冊在東京的出版。這部著作是一個住在橫濱的醫生千葉繁(1834-?)對美國人善亞頓（James Ashton，生卒不詳）所撰《自然之書》(*The Book of Nature*, 1861)的節譯。「造化機」一詞當是譯者的自創，在書的開頭部分即〈陽經論〉中，它是這樣出場的：

> 男子得繼嗣之機關，乃附著於體外之二物。一曰陰莖，一曰睾丸或外腎，又縷縷合稱「セニタルス」。睾丸為兩核一囊所包裹，自恥骨（又云交骨）部下垂。其釀造精液之功用，猶如女子卵巢之熟卵。實可謂造化之妙機也。[32]

文中的「セニタルス」，是原著中 genitals 的音譯。儘管杉田玄白(1733-1817)在《解體新書》中已經使用了「陰器」一詞，後來大槻玄沢(1757-1827)更改進爲「生殖諸器」（《重訂解體新書》，1826 年），但千葉繁皆棄而不用。其另創新詞的

（東京：筑摩書房，2014），頁 31。

32 善亞頓原著，千葉繁譯述，《造化機論》（東京：稻田佐兵衛發賣，1875），頁 1。影印版收入斉藤光編，《性と生殖の人権問題資料集成》，卷 27，頁 2。

動機，是因不滿前人譯詞的準確性，還是爲了更好傳達英文原著中的基督教色彩，今已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即該書中出現的「外腎」和「陰經」兩個詞是直接繼承自《全體新論》，同時「陽經」這個詞也可看作是對合信使用過的「外腎經」一詞的改進。因此我推測千葉繁以「造化機」來意譯 genitals 時，其靈感也許同樣是來自《全體新論》。因爲後者常常把基督教的神靈稱爲「造化」或是「造化主」，不但書中涉及傳教內容的地方有三十餘處之多，甚至有一節的標題即爲「造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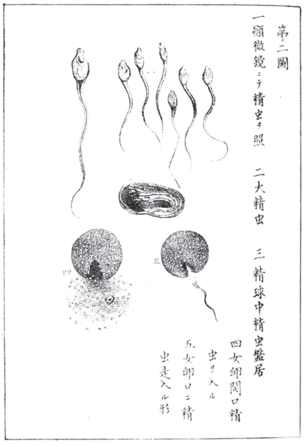
《造化機論》帶給日本人的眞正衝擊，不僅在於用語上的創新，而更在於其中所包含的許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以下不妨仔細檢視一下此書的內容，以呈現十九世紀性科學傳播到東亞地區時的最初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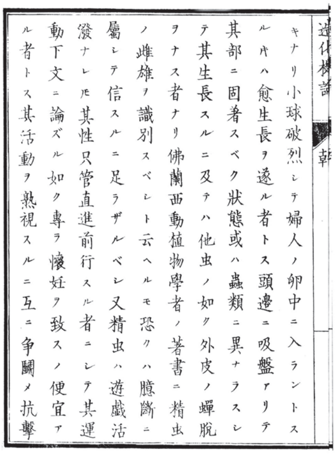
除了扉頁之上頗爲香豔的插圖（英文原題爲 Unimpregnated Female Form，即未孕女子之圖。圖三）和目錄，正文部分共有十八條。前三條是系統地介紹生殖器官的解剖學知識，包括〈第一條陽經論〉、〈第二條精蟲論〉和〈第三條陰經論〉。這部分的編排方式與《全體新論》相類似，但無論是解說之精細，還是篇幅之長大，都遠遠超過後者。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書中所附插圖的衝擊性視覺效果。這些插圖皆爲占據整頁的大幅彩色細密銅版畫，在對男女外陰部形態的逼眞展示中，不但「陰囊」、「龜頭」、「處女膜」、「左陰脣」等部位被一一標出，甚至陰毛也都是描畫得根根清晰且形態各異。至於「第二條精蟲論」中的插圖，也同樣是精緻而細密。它不但向讀者呈現了精子和卵子在顯微鏡下的形態，同時還描繪了精卵結合瞬間的生動情形（圖四）。

圖三　《造化機論》乾冊(1875)扉頁

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江崎文庫藏

圖四　《造化機論》乾冊(1875)中的插圖




造化機論　乾

キナリ小球破烈シテ婦人ノ卵中ニ入ラントス
ルトキハ愈生長ヲ遂ル者トス頭邊ニ吸盤アリテ
其部ニ固着スベク狀態或ハ蟲類ニ異ナラスシ
テ其生長スルニ及テハ他虫ノ如ク外皮ノ蟬脫
ヲナス者ナリ佛蘭西動植物學者ノ著書ニ精虫
ノ雌雄ヲ識別スベシト云ヘルモ恐クハ臆斷ニ
屬シテ信スルニ足ラザルベシ又精虫ハ遊戲活
潑ナレトモ其性只管直進前行スル者ニシテ其運
動下文ニ論ズル如ク專ラ懷妊ヲ致スノ便宜ア
ル者トス其活動ヲ熟視スルニ互ニ爭鬬メ抗擊

《造化機論》乾冊，頁 10。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江崎文庫藏。

〈第四條情慾之論〉是有關情慾和性高潮的解釋說明。「情慾」在這裡被解釋爲產生於男女陰部之「引力」——一種人的「言語思慮」不能左右、科學家也難以測量的強大力量。作者認爲這種引力乃是神的賜與，目的是讓人類無須特別學習即可自行繁衍和生生不息。因此他又把這種力量稱爲「自然之愛感」，同時推導出「吾儕」之義務，在於「負有人類繁殖之任」。不過，對於同時代科學家們作出的另一種解釋，善亞頓也不持否定態度。他介紹說科學家認爲男子爲陽極，女子爲陰極，男女之間的互相感應乃是一種「動物磁石力」發生作用的結果。這種理論的根據來自一個法國人的實驗，即某「動植物學著述者」曾經給一對壯健的少年男女施以藥劑，令二人半身麻痺之後再蒙其面而脫其衣，同時令二人陰部「輕觸」。實驗的結果，是二人皆出現「情感」發作的現象。善亞頓毫不懷疑「動物磁石力」說的正確性，甚至還更進一步補充說：「此自然引力之觸及陰莖，殆如電氣。引力之外，尚有神經之感力，亦輔助交接之道也。」

〈情慾之論〉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全面肯定性的快樂。「交合之快美，殆如癲癇之發作，又如電氣之激動。其令心體無不產生感覺，故精神爲之恍惚，以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於這種頗帶文學色彩的渲染，作者當然有其自認爲正當的解釋，即男女雙方在交合時，能否獲得「快美」是決定後代身心健康的一件大事。如果男子在交合時心有旁騖，則其兒必然「拙劣」。那些「古今曠世的人傑」之所以往往生於父母之「私通野合」，就是因爲其雙親交合之時，不但互相「一意愛戀」且「傾盡精力」的緣故。作者甚至還搬出亞里士多德的名字，強調先賢已經指出，如果有「醜陋

異狀」及其他殘疾之嬰出生的話，其根源皆在於父母交合之「不全備」。總之，男女雙方只有眞正獲得性的快樂，才能生育出聰明健康的後代。也許是受善亞頓這種觀點的影響，千葉繁在翻譯 orgasm 時特意選擇了一個十分美好的詞彙，定義男女「同室中快暢之極度」的概念，被他稱爲「佳境」。

按照法國學者Alain Corbin對十九世紀西方的新婚指南書的研究，在精子被發現之後的很長時期裡，甚至到了十九世紀末，西方社會也依然存在著對女子性高潮的古老信仰。醫生們認爲女子獲得性的痙攣，乃是生殖過程中必不可缺的一環，因此她們獲得快樂被看作是完全正當且值得讚美的。從《造化機論》的內容來看，善亞頓正是這樣一個女子性高潮必要論的鼓吹者，而千葉繁的翻譯也十分忠實地傳達了他的思想。不過，Alain Corbin也指出，同時代的西方衛生學者當中其實存在著不同意見，他們視女子的性能力爲危險之物，不承認妻子的任何主動性。而且隨著女子自動排卵的生理機制在法國七月王政時期被發現，女子在性交中的痙攣被認爲無益之物的思想也開始抬頭。[33] 當然，上述危險論和無用論的觀點，在《造化機論》中完全沒有被提及。

在情慾論之後，作者又帶領讀者進入生殖技術和遺傳學的世界，內容上包括〈第五條懷妊論〉、〈第六條胎兒男女之論〉和〈第七條胎兒生長論〉三部分。其中〈懷妊論〉首先介紹月經的原理，之後不但指出女子受孕的時間是在月經

---

33 アラン・コルバン(Alain Cobbin)，〈新婚夫婦の小聖書〉，收入デュビー、コルバン、アリエスほか著，福井憲彦・松本雅弘譯，《愛と結婚とセクシュアリテの歴史　增補・愛とセクシュアリテの歴史》（東京：新曜社，1993），頁 217-219。

停止後七天至十天內，同時也介紹了安全期的存在，指導讀者如何「自在」地避孕。按照上野千鶴子的考察，這部分的內容正確而詳細，尤其是其中提到的避孕法遠遠早於荻野久作(1882-1975)根據同樣原理於 1924 年發明的週期法，而前者卻被後世遺忘了。[34] 不過，在接下來指導讀者如何自主控制嬰兒的性別時，善亞頓的學說就顯得十分天眞爛漫了。他雖然批判了前人的臆說（如婦人交媾完畢如臥於男子右側可生男兒，臥於左側可生女兒之類），但他本人提出的新學說——胎兒的性別取決於母親懷孕後夫婦愛情之深淺，多欲之女子產女兒，寡欲之女子產男兒，若夫婦愛情不多不寡，則生男生女皆有可能——在今天看來，也同樣令人莞爾。此外，他還告訴讀者，如果婦人懷孕後與其他男子同居，那麼嬰兒出生後必不肖其生父而肖其新歡。這裡的遺傳知識，大致可看作是感應遺傳說(telegony)的旁流了。

以上爲《造化機論》乾冊的內容，同書的坤冊由以下篇目構成：〈第八條早年交媾之害論〉、〈第九條妄淫之後害論〉和〈第十條耽淫之害論〉三節集中討論性的病理，作者在這裡舉出許多實例，警告讀者房事過早或是過度（包括手淫），將導致如「神經全體總崩壞」之類令人膽寒的疾病。另外，作者在第九條後面還特意增設〈房事之位置〉一節，重點討論交媾時應該採取何種體位的問題。作者宣稱，除了他稱之爲「自然位置」——女子仰臥且雙腳伸直，或者腳略略提起——的體位，其他如「彼此直立」或是「隔山取火」之類，皆是「淫夫」或「下等之人」玩弄其妻並可導致「婦

---

[34] 上野千鶴子，〈解説〉，收入小木新造、熊倉功夫、上野千鶴子校注《風俗　性》（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 528-529。

人苦痛之病」的邪道。隨後的三節——〈第十一條論志意及才智〉、〈第十二條論資質之區別〉和〈第十三條婚姻及性質自然之理〉中，作者又依據古老的體液說，把人按照天生的體質區分爲神經質、黏液質、多血質、膽液質四類，講解各種體質的人之間相生相剋的原理以及應該如何結婚匹配。〈第十四條氣力之強弱論〉與〈第十五條生命寓在及長壽論〉的內容皆涉及大腦，包括大腦的病變以及腦底深度與壽命長短的關係。〈第十六條懷姙之鑒定論〉與〈第十七條產徵及誕生論〉的內容如其名目所示，大約都可以歸入產科學，而最後的〈第十八條滋養強壯藥〉則是藥學知識的介紹，文中登場的是「野麻葉」、「燐」、「硝石」、「斑貓」等幾種藥物，作者認爲它們皆有催淫效果。

作爲傳入東亞的第一部以近代用語和邏輯來全面闡述「性」的里程碑式作品，不難看出《造化機論》的內容實際上相當駁雜。除了解剖學上的知識，還旁及情慾論、妊娠出產之機制、遺傳學、性交技術、手淫過度之害、男女婚姻匹配之原理，乃至基督教的性道德等領域。雖然此書堪稱是各類性知識的一大集合體，但奇妙的是日文譯者偏偏沒有給原著中常見的 sex 一個統一的對譯詞，而是相當恣意地使用諸如「慾火」、「淫情」、「交媾」、「房事」這樣文學色彩甚濃的傳統詞彙，來表達原著中的 sexual desires 或 sexual intercourse 等概念。不僅如此，譯者甚至在譯文中還加入了諸如「隔山取火」和「弄五嬢」這樣的漢文俚詞。這些撩人的字眼，可以說把英文原著——一本面向即將結婚的美國青年男女帶有道德說教的科普讀物中所帶有的淫靡氣息，更作了一番強化。

《造化機論》的文體，和同時代的其他嚴肅著作一樣，爲使用片假名的生硬漢文調。因此如果沒有良好的漢文素養，想要讀懂此書也非易事（儘管如此，該書到 1908 年爲止仍然刊行了 16 版之多）。千葉繁在該書出版後不久即著手改寫，並於翌年以《通俗造化機論》(1876)爲題出版。新版使用的是更接近口語的和文體，同時也把原來的片假名改爲柔和的平假名。不僅如此，作者還不辭辛苦地給書中幾乎所有漢語詞彙標注了假名，以顯示其讀音或是解釋詞義。簡單的詞如「陰經」，被標注爲「おんなのもの」（女人之物）。而對於「佳境」這樣的重要概念，則右邊標注「かきやう」釋其音、左邊標注「ココチヨキコト」（快活之事）釋其義。至於書的銷售價格，也由原來的 80 錢降至 65 錢。總之，被 Alain Corbin 稱爲「新婚夫婦的小聖經」的西洋通俗讀物中的性知識群，在經過編譯者千葉繁的一番努力之後，開始了其在日本社會風行的歷程。

《通俗造化機論》問世之後，千葉繁又再接再厲，把美國人扶德(Edward Bliss Foote, 1829-1906)超過九百頁的大著 *Medical Common Sense*抄譯編寫成了另外兩部新著，分別題爲《通俗造化機論二編》(1877)和《通俗造化機論三編》(1879)出版。從這時開始，其他日本人也不甘落後開始加入這一領域的翻譯、編著和出版。於是如《造化祕事》(1876)、《通俗生殖器論》(1878)、《通俗造化生殖論》(1879)等書名雷同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由此開啓了一個通俗性科學書出版熱的新時代。從 1875 年到明治末期的約三十餘年間，根據石川一孝的統計，這類書籍的出版總數爲 322 種，其中書名帶「造化」二字的著作即超過了 50 種，堪稱壯觀。「造

化機論」四個字，到後來也由書名變爲普通名詞，成爲了明治時期通俗性科學讀物以及這類書中出現的各類性知識的總稱。上野千鶴子以這類著作誕生於文明開化期，所以又把其中的知識集合命名爲「開化性科學」。[35]

對於造化機論的文本群，上野氏還曾經作過以下分類：第一，翻譯翻案類。這類著作多來自英美文化圈，有濃厚的基督教性道德氣息。譯者一般不告訴讀者原典是何書，而多採用「譯述」、「編述」、「編纂」等策略，通過翻案、加筆、改竄等方法積極介入到文本內部。第二，上述翻譯翻案類的通俗大眾版。這類著作通俗易懂，內容上有實踐應用篇的傾向，所以帶有生殖技術實用書的色彩。其中出現的一些實用技術如「自在舉男兒生女子之法」、「令婦人生愛慕之奇法」等，頗有商業炒作之嫌。第三，融合基督教性道德與日本傳統性規範的性哲學啓蒙書。這類著作儘管受到譯著的影響，卻用日本式的表述加以改造，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人生之最大快樂在於一夫一婦」。另外，這些書中也不再舉西方的事例，而代之以日本人耳熟能詳的「秦皇隋帝」或是《伊勢物語》等。同時裝飾書籍的人物插圖也不是譯著中常見的亞當和夏娃，而換成了日本神話中的人類始祖伊弉諾兄妹。在同時期國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之下，夫婦和合的定位從「男女之義務」上昇爲「對國家之義務」。第四，處於江戶時代以來形成的傳統性文化延長線上的讀物。這類作品雖然也頻頻使用「造化」之類的新詞，但文體和內容都更接近江戶時期文人的遊戲筆墨。其中出現的生殖技術，如介紹如何生出

---

35 石川一孝，《明治造化機論年表》（觀音寺市：丸三書房，2013）；上野千鶴子，〈解說〉，收入《風俗　性》，頁 518。

「忠孝之男子」或是「貞操之女子」等，則有吸引讀者目光的應時炒作之嫌。最後，在上述四類著作之外，江戶時期貝原益軒(1618-1714)所著《養生訓》（1712 年成書），作爲對抗「洋風」的「先哲金言」也重新受到關注，1870 年代末以後有一系列相關著作問世。[36]

造化機論的內容駁雜且文本眾多，關於其中的情慾論述，赤川學作過非常精緻的分析。他的一個重要指摘，是指出造化機論中的「情慾」概念與大正時期以後的「性慾」概念之間的重大區別。「性慾」概念是兩義的，不但被看作是身體和心理的問題，同時也被看作精神和心靈的問題；但是造化機論中的「情慾」則精神側面十分稀薄，更多的是與男子性器官聯繫在一起。在「無睪丸則無釀精管，無釀精管則無精液，無精液則情慾不起」等論述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性器官乃是情慾發生之因」的共識，赤川氏將其命名爲「情慾的性器還原說」。在此認識之下，「交合的快美」或「佳境」被賦予的價值僅在於其對生殖之必不可缺。另外，在講述女子情慾時，造化機論一邊強調其派生於生殖器官，一邊也常常談到愛情的作用，認爲只有男子通過「溫言親嘴」讓女子感到愛情，才可引發後者的情慾。[37]

除了「情慾的性器還原說」，在造化機論中大放異彩的，還有電氣說。這種理論在木本至《手淫和日本人》中被戲稱爲「愛與性的物理學」，又被命名爲「性感電氣說」。而赤川學則將其細分爲「三種電氣說」和「陰陽二電氣說」，且

36　上野千鶴子，〈解說〉，收入《風俗　性》，頁 522-527。

37　赤川学，《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歴史社会学》，頁 100-104。

將二者定位爲造化機論特有的認知(episteme)。[38] 善亞頓在《造化機論》中提到的以男子爲陽極、女子爲陰極的「動物磁石力」，大致即與「陰陽二電氣說」相類。不過在造化機論著作群中，自千葉繁譯述扶德原著的《通俗造化機論二編》以下，有許多著作津津樂道的是「三種電氣說」。這種學說認爲男女交合時會有三種電氣產生，分別是人身電氣、舍密電氣（「舍密」是荷蘭語chemie的音譯，後來改稱「化學電氣」）和摩擦電氣。這裡不妨以一部後出的造化機論著作——細野順纂譯《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1888)爲例，以見其概。這部書在同類著作中是介紹電氣說最爲詳細的作品之一，而且後來傳到中國且出現了至少兩種中文譯本（詳見下節）。編纂者細野順自稱「帝國醫科大學卒業生」，其人經歷不詳。

按照細野的介紹，所謂人身電氣又叫肉身電氣，天地間的動物中以人爲最多。交合時這種電氣會從全身「湊合」到陰部，於是就產生了「快味」。不過該電氣有積極、消極之別，所以快感亦因之有大小。如果男女間人身電氣異質，則快味「殊深」。反之，如果男女間電氣爲同質，快味則將化爲烏有。所謂化學電氣，則是一種由物質間的化學反應所產生的電氣。因爲男子陰部聚集酸性物，女子陰部聚集鹽基性物，所以交合時二物發生混合與抵抗，可助快味的電氣於是又生焉。至於摩擦電氣，本來也是分布於全身的。其最多之處，男子在陰莖的龜頭部，女子在挺孔即陰核部。如通過「手淫」或是「股間淫」摩擦這兩個部位，雖然也會產生「一時

---

[38] 木本至，《オナニーと日本人》（東京：インタナル株式会社出版部，1976），頁 77；赤川学，《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歴史社会学》，頁 104-106。

之快美」，但因爲只能產生一種電氣，所以將給身體帶來大害。[39]

從細野的解說可知，三種電氣說的特別之處，是利用一系列物理學和化學的專門用語，爲男女交媾的奧祕提供了一種帶有科學色彩的解釋。從這種理論出發，人的各類性活動在得到完美詮釋的同時，也被重新排序。簡單地說，就是產生電氣種類的多少，成爲衡量某種性活動的存在價値的指針。夫婦之間的交合，由於可令三種電氣全部產生，因此位於性愛排行榜的頂端。而其他的性活動，特別是諸如向娼妓買春、同性之間的性愛或者手淫等，則因爲只能發動部分電氣，而被看作是對身體和精神均有大害的危險惡習，所以在性愛排行榜中只能排在下面。

電氣說除了可以用來貶損那些與生殖無關的性活動，還可用來解釋社會現象。如與《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內容上大同小異的《男女自衛造化機新論》（武藤忠夫著，1895）一書，就是把電氣說和體質說相結合，從各種體質的男女之間吸引力不同以及交合時產生電量不同的角度，「科學」地解釋了男女間爲何有姦通和私奔現象的發生。[40]

電氣說在日本廣泛傳播的背景因素之一，是 1882 年制定的刑法。在這部法律中，一夫一妻第一次被納入了正式的法律條文。上野氏和赤川氏均認爲，電氣說的觀點有濃厚的科學色彩，其在現實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是給「一夫一婦

---

39 細野順纂譯，《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東京：聚榮堂，1888），頁 176-178。所謂「股間淫」，是指男子以陰莖在對方男子的兩股之間摩擦取樂，日語俗稱「すまた」，明治時期流行於青少年中。

40 水城學人校閱，武藤忠夫著述，《男女自衛造化機新論》（東京：嵩山堂，1895），頁 52-53。

及夫婦和合的意識形態提供了一種生物學上的依據」。[41]

造化機論問世之後帶給明治時期日本社會的影響可謂深遠。與其同時勃興的，眾所週知是著名的自由民權運動。木本至的研究表明，這場運動中最著名的鬥士植木枝盛(1857-1892)就是造化機論的狂熱讀者，他的追求男女平等和肯定性愛一致等激烈主張，皆與其對性科學的孜孜探求密切相關。[42]

不過對於更多的普通日本讀者來說，造化機論是兼具知識啓蒙和助淫兩種功能的讀物。一本刊於京都的題爲《我樂多珍報》的雜誌在 1880 年 2 月曾經出過〈讀造化機論〉特集，其中有兩首狂詩，一云「獨握龜頭讀機論，知得精蟲作子孫。造化奇妙感心至，始識手淫弱心魂」；一云「玉門畫的妙，世人誰不欣。近眼來一見，此是何等紋」。可以說皆活寫一些日本讀者閱讀造化機論的實際情形。

與讀者的口味變化相關連，造化機論帶給日本出版業的影響可以說是一喜一憂。對於部分傳統出版業者來說，造化機論的到來幾無異於滅頂之災。前述〈讀造化機論〉特集中還有一首狂詩云：「書生閒居獨自樂，後家處女又穴濡。春畫婬本今無在，唯看造化機論圖」。其反映的正是明治十年代「春畫本廢而造化史興」的世相。[43] 而對於出版西學著作

---

41 上野千鶴子，〈解説〉，收入《風俗　性》，頁 518；赤川学，《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歴史社会学》，頁 106-107。

42 木本至，《オナニーと日本人》，頁 96-107。

43 所謂狂詩，是指內容以滑稽為主，且大量使用日語俚詞的一種日本漢詩體裁。這裡引用的三首漢詩，皆出自《我樂多珍報》（東京：柏書房復刻，2008）第 30 號（1880 年 2 月）中的〈讀造化機論〉特集，頁 107-108。「春畫本廢而造化史興」一句，見於《東京新誌》明治十二年(1879)事物盛衰記，轉引自赤川学，《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歴

的業者來說，造化機論的存在無異於可帶來利潤的搖錢樹。因此在他們的宣傳話語中，存在著強調其科學性一面的傾向。由東京書籍商組合事務所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是東京地區的書商們製作的最早的聯合銷售書目，也是今天《圖書全國總書目》的前身。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刊的該書目初版中，造化機論所處的位置，是〈第一門醫學〉中〈生理學〉下面的〈通俗〉，且被放在學校用的各類教科書之後。另外還有部分同類著作，則被收到〈衛生學（養生書）附看病學〉之中。[44] 不難想像，即使到了 1890 年代以後，有相當多的造化機論出版物仍然是被宣傳爲有用的醫學書，被擺放在書肆店頭銷售的。

不過在明治政府看來，這些著作卻是可能給社會的良風美俗帶來危害，令人頭痛。其實早在 1879 年 7 月，前田喜三郎著《男女交合論》就被指定爲禁書第一號，爲當政者取締造化機論之濫觴。[45] 在此後的三十年間，這種取締的力度不斷加劇，同時取締範圍也不斷擴大。木本至認爲明治政府在取締過程中採取的是一種「洋尊和卑主義」策略，即對於西人的譯著大致多是網開一面，但對於日本氣息濃厚的作品則予以無情處罰。到了大正二年(1913)的時候，取締終於全面升級，包括千葉繁《造化機論》在內的所有同類書籍皆被指定爲禁書。[46]

史社会学》，頁 82。

[44] 東京書籍出版營営業者組合事務所，《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東京：明治文献復刻，1975），頁 3-11。

[45] 石川一孝，《明治造化機論年表》，頁 3。

[46] 關於明治政府對造化機論的取締，參見木本至，《オナニーと日本人》，頁 125-127、145。關於造化機論類書籍的禁書目錄，參見內務

造化機論最終被全面取締，其背景之一是日本學界對其評價的變化。雖然流行日久且著述者眾多，但造化機論在日本始終只是作爲一種通俗知識流行於市井。到了明治後期，隨著在大學等近代教育機構接受過專門訓練的學者登上論壇，他們之中有一些人開始把造化機論作爲假想敵，從正面質疑其可信度。如醫學者富士川游(1865-1940)於 1900 年發表在《兒童研究》雜誌的一篇論文中（〈關於學齡兒童的色情〉），就強烈批判「通俗的生殖機論」之「記事不確」，同時警告說「無醫學知識之人不宜閱讀」這類書籍。[47]

富士川游的警告，當時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接受，今已不得而知。但可以確認的一點是，造化機論在日本經過二十餘年的流行，到二十世紀初已經顯露一些垂暮殘敗景象了。不過對於同時代的中國知識人來說，富士川的聲音似乎還太遙遠，以致沒有人聽到。在他們眼中，造化機論中的各種知識不但內容上看起來新鮮奇特，而且其中還似乎蘊藏著可以拯救國難的祕策。於是當東學開始大行其道之後，造化機論作爲其中的顯學，迅速登上了中國這個新舞台。

三、造化機論之東學西漸

甲午戰爭後的十餘年間，面對「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的現實，中國知識人已不再把關心局限於如何改

省警保局編，《自明治二十一年至昭和九年禁止単行本目録》〔收入《発禁本関係資料集成》（東京：湖北社復刻，1977）〕，頁 55-79。

47 轉引自赤川学，《明治の「性典」を作った男　謎の医学者・千葉繁を追う》，頁 209-210。

造外部社會。如何改造中國人自身，在他們眼中也成爲緊要課題。借用梁啓超(1873-1929)在〈醫學善會敘〉(1897)中的表述，就是「不求保種之道則無以存中國」。[48] 在此種共識之下，與「種」息息相關的各類新學知識均受到廣泛關注，其範圍涵蓋了生理學、衛生學、進化論、優生學乃至體育等許多領域。而涉及性話語的出版物，也有不少夾雜於其中。

在清末知識人中，對於中國人在性領域必須建構新的學問這一點最早作出明確闡述的，是譚嗣同(1865-1898)。在其代表作《仁學》（完成於 1896 年前後）中，他有如下主張。

> 俗間婦女，昧於理道，奉腐儒古老之謬說為天經地義（中略）……而不知男女構精，特兩機之動，毫無可羞醜，而至於人間隙也。中國醫家，男有三至，女有五至之說，最為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醫之精化學者，詳考交媾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涎液質點如何情狀，繪圖列說，畢盡無餘，兼範蠟肖人形體，可拆卸諦辨，多開考察淫學之館，廣布闡明淫理之書，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徒費一生嗜好，其事乃不過如此如此，機器焉已耳。[49]

譚嗣同創作《仁學》的目的，是衝決籠罩在中國社會中的重重網羅。他夢想建立一門新的「淫學」，以打破倫常中重男輕女的「暴亂無理之法」。引文中「男有三至」、「女

48 康有為，〈保國會章程〉，收入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54；梁啓超，〈醫學善會敘〉，轉引自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第 2 版），頁 64。

49 該書最初連載於梁啓超主編，《清議報》，1899。引自譚嗣同著，印永清評註，《仁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頁 102。

有五至」的說法，見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刊的醫書《秘本種子金丹》上卷（葉天士著）。這部書是以中醫的氣血和臟腑理論，探討男女如何才能在交媾時使男子之肝氣、心氣、腎氣與女子的心氣、肝氣、肺氣、脾氣、腎氣至於各自的陰部，以達到「情洽意美，無不成胎」的效果。[50] 值得關注的是，譚嗣同一方面認可西洋醫學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對於傳統的房中理論仍然信心十足。「最爲精美」的四字評語，可以說正是這種信心的寫照。《仁學》中所描繪的「淫學」發展藍圖，簡單地說，就是把房中術與解剖學知識進行嫁接，之後再通過「淫學之館」和「淫理之書」普及到千家萬戶。

譚嗣同在 1893 年和 1896 年曾兩次訪問上海，在滬期間通過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接受了西學的洗禮。《仁學》第四十六節中出現的「進種之學」一詞，也顯示他對嚴復提倡的優生學有相當興趣。[51] 在察覺時代動向這一點上，譚嗣同可以說極爲敏銳。只可惜他後來捨身取義，在進一步充實其「淫學」構想之前便過早離開人世。

幾乎就在譚嗣同構想「淫學」的同一時期，維新派領袖康有爲(1858-1927)卻提出不同見解。在晚清知識人中，他是首先意識到造化機論的存在並爲之呼籲的人。事實上，康在 1880 年代就開始關注日本的新學，留下了四十餘篇閱讀日譯西書目的筆記。[52] 戊戌變法開始以後，他除了立即上書請求廣譯日本書（〈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摺〉，1898 年 6 月 1

---

50 土屋英明，〈中國の性愛文献　百六十三〉，《東方》（東京），号 357（2010 年 3 月），頁 22-23。

51 坂本弘子，〈中国的優生思想與翻譯〉，收入王中忱等主編，《東亞人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第 1 輯，頁 311。

52 康有為，〈筆記〉，收入《康有為全集・第一集》，頁 193。

日）之外，還刊行《日本書目志》一書以展示東學之「精要」，並於 1898 年 8 月 19 日將該書進呈御覽。就我所知，這是造化機論在中文世界的首次登場。

《日本書目志》十五卷共介紹了日本的新學著作計 7,725 種。這些日本書籍沒有按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而是被分爲十五門。在位於卷首的〈生理門〉中，收入了下面這些屬於造化機論的著作。

造化懷妊論　一冊　四分

造化機論　一冊　七分

訂正增補　通俗造化機論　一冊　岩本吾一編　三角五分

通俗男女造化機論　小本　一冊　岩本吾一輯　八分

通俗生殖器論　一冊　長谷川竹葉　訳　七角五分

男女交合新論　一冊　橋爪貫一　譯　一角

男女自衛論　一冊　三宅虎太　譯　一角八分

普通生理学　二冊　江馬春熙　著　一角

夫婦互之務　一冊　渋谷如鉄　著　四分

婦女性理一代鑑　一冊　堀誠太郎　訳　三角

生理及衛生　一冊　児島文茂　輯　一角二分

上面這些著作被康有爲命名爲「生理學通俗十一種」，列於〈生理學學校用二十三種〉教材之後。另外在生理門下面的〈衛生學三十八種〉的欄目中，還收有下面兩書，從書名看也是屬於造化機論系列的。

子育必携　產育造化機論　一冊　浅利保正　著　一角

男女交合論　一冊　六分

康有爲在《我史》（即《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二年的紀錄中，有「至是年得日本書甚多，乃令長女同薇譯之，稿乃具。又撰日本書目志」之語，翌年又云「日本書目志成」。[53] 可知該書大致編纂於 1896-1897 年間。不過王寶平已經指出，康氏的編纂工作，實際上是全面依靠一部日本的圖書銷售書目，即前述《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54] 對照兩書中的造化機論部分，不難發現上述 13 種著作，無論是分類方法還是排列順序，皆是一模一樣。康有爲針對原書所作的改動，不過是把作者的名字用全名標出（如用「長谷川竹葉」替代原書目中的「長谷川」）、把書的定價改爲中國式（如用「七角五分」替代「定價七十五錢」）、把書名中的假名改爲漢字（如用「夫婦互之務」替代「夫婦互ノ務」）以及刪除原書目中的出版商名字。

《日本書目志》的抄襲痕跡雖然明顯，但書中的按語則無疑是康有爲本人的思考結晶。這些按語有的來自 1880 年代後期的讀書筆記，有的則是重新撰寫的。它們被附加在每一類書目的後面，內容反映康對該學術領域的評價。〈生理學通俗十一種〉後附的按語內容如下。

>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往哉生生。乾端坤倪，鴻濛屯蒙，呈露文明，皆賴人為。人之明智首出者，皆欲窮造化之故、萬物之理，至于有生之

---

53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181-185、282-283；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康有為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33。

54 王宝平，〈康有為『日本書目誌』出典考〉，《汲古》，号 57（2010 年 6 月），頁 13-29。

自來，乃罔知之，舍近而圖遠，明人而昧己，豈不戾哉！凡學，有可通，有可不通。如生理之學，近取諸身，人皆有之，凡學者所宜，盡人明之。吾《素問》少發其源，泰西近暢其流，鼇傑兒氏、蘭氏、歇兒蔓氏，大唱元風，蘭氏闡析尤精矣。日本盡譯其書，施之學校，行之通俗，源之造化，達之男女。由受形之器推其天命之精，蓋為物理學之源，心靈學之本。由此以入于哲學，則四通六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矣。若其學校通俗之書，訓蒙問答教科，條理曲備，生理圖及達兒敦氏生理書，衛生學尤精矣。老子曰：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既來之，則安之。通其理，衛其生，蓋人道之本、治學之始哉！[55]

這段評論值得矚目的地方，一是文章大量引經據典，卻完全沒有提到造化機論的具體內容爲何，因此我推測康氏沒有接觸過這類著作。二是作者把造化機論與學校用生理學教科書相提並論，這明顯是受到《書籍總目錄》中對書籍分類排列方式影響的結果。同時該目錄還令他誤認爲日本學校在向學生教授造化機論中的知識。三是對造化機論的正面評價，如「物理學之源，心靈學之本」或是「人道之本、治學之始」云云，幾乎達到了恣意的程度。從結果來說，在日本人關於造化機論的各種話語之中，最終左右這位維新領袖認識的，是日本書商的宣傳。

《日本書目志》出版後不久，維新運動即受到挫折，康

55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生理門第一，收入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267。

本人也被迫流亡國外。改革運動雖受到沉重打擊，但西方的性知識爲強種救國所必需的觀念，卻開始被國人普遍接受。大約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造化機論開始被翻譯引進，數年之中甚至還出現了一個出版熱潮。以出版物的形態而言，流通於清末圖書市場的造化機論大致說來有四類，即日文版、日文版的中譯本、日本人的漢文編纂本以及中國人的編纂本。以下不妨略觀其大概。

關於直接引進的日文版，查《申報》的廣告欄可知，在上海從事此項生意的有理文軒書莊和日清書館兩家書肆。其中理文軒書莊爲英商，其正式名稱是理文軒中外書會，位於四馬路第一樓後門對面，書肆主人名叫戎文彬。日清書館爲東商，位於三馬路朝宗坊口。從 1901 年 5 月開始，這兩家書肆均在《申報》上刊登單獨的或是聯合的日本書籍銷售廣告，並一直持續到翌年。在這兩家書肆的廣告中，造化機論類的書籍占有相當多的比重。

圖五是理文軒中外書會單獨刊登在《申報》（1901 年 6 月 20 日）上的圖書銷售廣告。廣告中的文字告訴讀者，理文軒在東京設有「五彩石印銅版書局」，除了經營印刷業，也「批發外國書籍地圖畫譜法帖」。廣告文的後半部分，是「新出有用之書」的書單。從排列得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可以辨認出以下內容：「《日清韓三國詳細地圖》等地圖類商品計二十九種、《小學修身訓畫》二十幅等學校用掛圖以及世界各國皇帝像、日本歷代天皇像等圖畫類商品計六種、羅布存德著《華英字典》等辭書類書籍計二十八種、造化機論著作九種，其他書籍（《日本風俗》）一種」。其中，造化機論類書籍的書名和定價如下：

圖五

生殖器新書　一元五角

普通妊娠論附小兒養育法　一元三(角)

通俗造化機論　六角

男女交合機論　五角

無上之快樂　四角

男女交合新論　五角

男女造化機論　七角

男女造化機新論　七角

男女交合秘訣　五角

理文軒中外書會的日本書銷售廣告，
《申報》，1901 年 6 月 21 日。

除了單獨的廣告，理文軒也與日清書館刊登聯合廣告。如刊登於 1901 年 12 月 17 日《申報》的廣告中，造化機論類的書籍——廣告主在書單前特意加上了「東洋新到」四個字——同樣與小學讀本以及各類辭典地圖一起出現在商品名單中。這些書籍共計 11 種，書名和定價如下：

> ○男女交合秘密法二角○男女交合造化機論七角○男女交合機新論七角○無上之快樂四角○男女交合新論五角○繪像交合新論七角○通俗男女造化機論

七角〇男女快樂交合秘密論七角〇通俗男女交合新編五角〇男女生植機論四角〇普通妊娠論附小兒養育法一元三角。[56]

從上述廣告可知，至少有十餘種日文版造化機論在上海的圖書市場上流通。由於造化機論的書名大多雷同（如題爲《男女交合新論》的書在日本就至少出現過4種），因此這些著作中有的難以確認其具體所指。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即無論是理文軒還是日清書館，都是把這些書與學校教育類出版物同時引進，且放在一起堂而皇之地銷售。如果富士川游有機會來上海看見書肆中的這種景象，定然會大吃一驚吧！

從上面書單來看，進入中國的造化機論原版著作在內容上缺乏統一的方向性，質量上也是良莠不齊。其中既有專講生理學的嚴肅著作，也有宣傳基督教性道德的倫理書，還有繼承江戶性文化傳統的文人戲作。屬於最後一類的典型作品，是《男女交合無上之快樂》（即廣告文中的「無上之快樂」，1898年大阪梶尾商會刊）。該書首題「東都愛情散史校閲，浪速艷情笑史著」，序言部分的作者則署名爲「快樂無上人」。同時，從該書的〈色之道〉、〈春心〉、〈鴛鴦之夢〉等章節名稱，即不難察知書中內容之偏於文藝且筆調輕佻，與以傳授知識爲目的科普著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順帶一提，就在理文軒熱銷上述圖書的同時，其店主戎文彬因爲販賣「淫書」，於1901年9月被租界當局罰洋廿元並登報謝罪。從戎的謝罪文可知，租界當局之所以懲罰他，是因爲理文軒曾賣出了一部《古今奇觀》，而不是因爲出售包括《男女交合無上之快樂》在內的那十餘種造化機

56 〈五彩地圖書籍大減價批發〉，《申報》，1901年12月17日。

論。[57] 後者混在教育類書籍當中，以新知識載體的面目登場，在晚清的書籍市場上可以說是暢行無阻的。

清末讀書人中到底有多少人購買或是讀過這些日文版的造化機論，今已不得而知。不過從孫寶瑄(1874-1924)的日記中，可以窺見當時的一部分讀書人對造化機論原版書的關心程度。孫氏生於官宦世家，所交皆一時俊傑。二十世紀前後的數年間，他寓居上海，一邊隨日本人佐伯某和松林某（東本願寺上海別院僧人）習東文（據孫氏自己的說法，其學習目的是爲了「習閱哲學書」），[58] 一邊以極大的學習熱情廣泛涉獵各類新學書籍，其中自然也包括原版的造化機論。如《忘山廬日記》辛丑年(1901)7 月 13 日條云：

> 蚤。購得東文書數種，曰《普通妊娠法》，渡邊光次著；《男女造化新論》，武藤忠夫著；《生植器》，美國佛栗智國著。又《日本新地圖》、《萬國新地圖》兩冊。[59]

這裡提到的三部著作，皆見於上面理文軒的廣告。其中渡邊光次著《普通妊娠法》有誠之堂書店刊本，初版時間不詳，其改訂增補版至 1904 年時已經出至第 15 版。[60] 武藤忠夫著《男女造化新論》，有明治二十八年(1895)刊本（青木嵩山堂發賣），該書封面題寫「醫學士水城學人校閱武藤忠夫著述男女自衛造化機新論」。至於美國佛栗智國著《生植器》，當是指由東京博文館出版的《生殖器新書　全　一名　既婚

57 　戎文彬，〈知我諒我〉，《申報》，1901 年 9 月 10 日。

58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頁 302、362、414。

59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頁 384。

60 　原書未見。同志社大學圖書館藏有該書的訂正第三版（1900 年刊），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東京）有該書第 15 版。

未婚男女必讀婚姻案内》（米國醫學博士ホリック著，日本醫學士守矢親國譯，1897）。這幾部書對於初學日語的孫寶瑄來說，應該不是能輕易讀懂的。事實上，他也沒有在日記中留下關於它們的任何評論。

孫寶瑄作爲日語初學者，要讀懂原版造化機論的難度雖然可想而知，但其購書熱情並未因此減弱。在翌年即光緒 28 年 10 月 30 日的日記中，他再次留下了購書紀錄。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一次他在日記中留下了自己的讀後感。

> 夜，觀劇，忽厭倦，遂閑步至第一樓品茶。買書二種：曰《吾妻鏡》，曰《男女交合無上之快樂》……（中略）。《男女交合無上之快樂》，日本人著，與《交合新論》略同。其中有云：男子精蟲，為山中之金銀；女子精卵，為海底之珠玉。皆可至寶者。頗有悟境。[61]

引文中提到的《男女交合無上之快樂》相關內容，見該書第十九章〈山中之金銀與海底之珠玉〉，「金銀」、「珠玉」云云不用說皆爲文學比喻。對於孫寶瑄這樣的清末讀書人來說，比起那些意思上介於可解不可解之間的新名詞，修飾性的文學辭藻不但好理解，而且內容上也似乎容易引起共鳴。他把「頗有悟境」的讚辭送給一部帶有江戶文人筆墨遊戲風格的作品，我想理由也正在於此。

流通於清末圖書市場的造化機論中的第二類著作，是日文版的中譯本。這類譯著在當時氾濫一時，由於書籍市場之無序，其中包含相當一部分劣作——坊間的書賈爲射利取盈，而將已刊書籍肢解割裂或是改頭換面後的產物。眞正被完整介紹給中國讀者的造化機論作品並不多，就我所知主要

---

[61]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頁 598。

有下面幾種。

譯成中文的時期既早、流傳也最廣泛的著作，是法烏羅（フアゥラー）原著、橋爪貫一(?-1884)翻譯的《男女交合新論》。該書原題《男女之義務》，1878 年獲得明治政府的版權許可，翌年由東京春陽堂刊行。1887 年春陽堂將該書改題翻刻，至 1892 年時已出至第九版，1912 年 2 月以後始被日本官憲列爲禁書。橋爪貫一號松園，爲明治時期知名報人，以翻譯各類啓蒙書著稱，其譯著數量達到一百六十餘種之多。據他在〈男女交合新論敘〉中的介紹，此書爲「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米國骨相學大博士フアゥラー氏の著述するクリエチフ、エンド、セキシュアル、サイエンス」一書中的生殖編的抄譯。[62] 此書的英文原著，當爲美國人Orson Squire Fowler (1809-1887)著*Creative and Sexual Science, or Manhood, Woman hood,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1875)。該英文原著超過千頁，橋爪的日譯本在內容上與英文原著究竟有怎樣的對應關係，尚待今後研究。

《男女交合新論》最早的中譯本，是由憂亞子翻譯，橫濱的清議報館發行的刊本，發行兼編輯人爲馮鏡如。[63] 譯者

---

62 Flower 日譯為「發烏羅」，中譯為「法烏羅。行文中除引文外一律作「法烏羅」。發烏羅原著，橋爪貫一抄譯，《男女交合新論》（東京：春陽堂，1888，第 5 版），卷首松園主人，〈男女交合新論敘〉。

63 1901 年 6 月發行的《清議報》第 83 冊有該書的發售廣告，其內容如下：「此書係憂亞子譯自美人法烏羅所著書。其中言男女閨房之事，進種改良之方，導人以愛樂，戒人以淫慾。間附精工圖繪，文詞暢達，議論新奇，誠為人不可不讀之書也。現托本館代售，每部取實價三毫五仙，外埠加郵費六仙」。《清議報》5（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頁 5236。按，《男女交合新論》的中日譯本在原作者表記上略有差異，日文版為「發烏羅」，各類中文版則皆作「法烏羅」。本

憂亞子是清末留東學生中的活躍人物，他在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這本《男女交合新論》，還翻譯了政治小說《累卵東洋》以及增補梁啓超的《和文漢讀法》。憂亞子與梁啓超關係極近，據夏曉虹的考察，其人有可能是羅普（字孝高，1876-1949）。羅氏亦爲康有爲弟子，與梁啓超是萬木草堂時代的同學，1897年赴日留學。受到康氏青睞的造化機論，首先由其自認擅長日文的弟子翻譯介紹給國人，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事。[64]

令人驚訝的是，《男女交合新論》在橫濱甫一問世，國內就迅速出現了其他版本。1901 年 7 月 1 日的《中外日報》上登載有《戒淫養生男女種子交合新論》的發售廣告，廣告文中作者題爲「美國法烏羅、日本神田彥太郎」，銷售地點則爲理文軒和日清書館。[65] 另外在徐維則編《增版東西學書錄》(1902)中，有「男女交合新論一冊　上海日清書館印本」的紀錄，作者則題爲「美法烏羅著，日本神田彥太郎、王立才編輯，憂亞子譯」。[66] 從書誌信息推測，國內的這兩個版本大致是清議報館版的修訂版。

《男女交合新論》是惟一被收進《增版東西學書錄》的造化機論著作。編者徐維則將其歸類到〈全體學二十一附心靈學〉之中，並說該書「首論精神之愛，中論交合之要，終論妊娠之源，其闡發製造兒女之法可謂透辟。讀此書於強種

文的引用皆依照原文。

64 羅普有〈任公軼事〉一文，云「任公欲讀日本書，而患不諳假名，以孝高深通中國文法者，而今又已能日文，……因著有《和文漢讀法》行世」。見夏曉虹，《晚清的魅力》（天津：百花出版社，2001），頁 77-78、90-91。

65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頁 151-152。

66 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收入熊月之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124。

改良之道深爲有益，世人每作淫書視之則大謬也」，可以說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此書在清末民初時的異本之多，堪稱壯觀。據中國文學研究者武田雅哉介紹，該書的異名計有《男女衛生交歡論》、《男女愛情合歡新論》、《繪圖房中術》、《男女交合秘要新論》、《男女秘密種子奇方》、《生育指南房中術》等多種。[67] 在中國國內銷售舊書的「孔夫子舊書網」上，我還另外找到《男女快樂衛生法》、《男女交合衛生新論》、《繪圖攝生種子奇方》等其他版本。[68] 本文我所使用的版本中，還有民國三年(1914)仲夏由上海文益書局總發行的《男女新法衛生秘要新論》（上海圖書館藏）。此版本卷首有十餘幅插圖，皆取自細野順纂譯《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的中譯本，而正文部分題爲「男女交合秘要新論　美國法烏羅著　支那憂亞子譯」，內容上包含了《男女交合新論》的全部章節。

就《男女交合新論》的內容而言，如果拿中文版與日文版對照，不難發現中文譯者所作的一些重大改動。日譯本帶有強烈的基督教性道德色彩，如題爲〈第七　將爲父母者，爲未生兒當修養其才德行狀〉

> 將為母者，當感佩上帝設此靈妙之事業。蓋上帝以母體為設生之主，又令月信告知設生之期也。當得良人之協助，共相勵精盡力，以遂女子之義務。[69]

按照上野千鶴子的說法，在日本的造化機論著作群中，

---

[67] 武田雅哉，《桃源郷の機械学》（東京：作品社，2005），頁 276。感謝武田教授提供《男女秘密種子奇方》、《男女衛生交歓論》的文本。

[68] 孔夫子舊書網：www.kongfz.com（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5 日）。

[69] 發烏羅著，橋爪貫一譯，《男女交合新論》，頁 41。

幾乎原封不動地引進十九世紀美國清教徒式浪漫愛情意識形態的代表作，首推這部《男女交合新論》。[70] 法烏羅在書中的主張，概括地說就是強調愛・性・結婚的三位一體以及「精神之愛」與「肉體之愛」的一致，同時動用各類知識來證明其主張是有科學依據且合理的。但是在中譯本中，上述基督教性道德的色彩被嚴重沖淡不說，甚至連日譯本中隨處可見的「上帝」兩個字也都不知去向。憂亞子在〈第七胎教非臆說〉中，對上述引文是這樣意譯的：「將爲母者，當思月信；天生女子，自有義務；宜勵精盡力，不愧賢助之名。」[71]

另一部受到晚清人士重視的造化機論著作，是東京博文館刊的《生殖器新書　全　一名　既婚未婚男女必讀婚姻案内》（即孫寶瑄購買的那部《生植器》）。此書爲Frederick Hollick（1818-1900，日人曾譯其名爲「哈犁克」）著*The Marriage Guide, or Physiological and Hygienic Instructor for the Married, or Those Intending to Marry, Both Male and Female*的日譯本。據譯者守矢親國介紹說，Hollick乃是「有名的生殖器病專門之大家」，該書在美國曾重版達五百次之多。[72]

這部著作的中文版有兩種。我寓目過的一種是由嘉定的日新書所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印行的《生殖器新書》前後編（美國霍立克著，寶山仇光裕口譯，上海王建善筆述）。據序言作者范熙庸介紹說，譯者之一的仇君是「明於西國醫理而又精西文者」，而王君則是「明於中國醫理而又精中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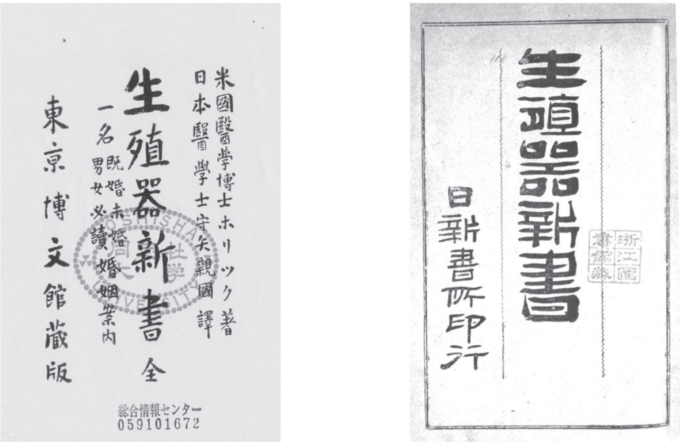
70　上野千鶴子，〈解説〉，收入《風俗　性》，頁 525。

71　法烏羅著，誘民子譯，《男女交合秘要新論》（該書封面題《男女新法衛生秘要新論》，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25。

72　ホリック著，守矢親國譯，《生殖器新書　全　一名　既婚未婚男女必讀婚姻案内》（東京：博文館，1897），〈例言〉。

且兩人「從事於中西醫學皆有十有餘年」。[73] 因此這部書可以看作是清末醫學界對造化機論的反應。雖然此譯本完全沒有提到日譯本的存在，但對照兩者，不難發現中譯本裡出現的新名詞（包括書名）幾乎都取自守矢的日譯本（圖六）。

圖六　霍立克著《生殖器新書》的日文版和中文版書影



左：守矢親国譯，1897，同志社大學圖書館藏；
右：仇光裕口譯，王建善筆述，1901。

顧燮光在《譯書經眼錄》卷之五中收入此書，盛讚其爲「衛生強種之祕笈」，又云其「所論卵珠精蟲各理足與《交合新論》參觀」。[74]

日文版《生殖器新書》還有另外一種中譯本，題爲《婚姻指南一名既婚未婚男女必讀》（全一冊），由橫濱的啓智

73　范熙庸，〈生殖器新書敘言〉，收入霍立克著，仇光裕．王建善譯，《生殖器新書》（嘉定：日新書所，1902），頁 3。

74　顧燮光，《譯書經眼錄》，收入《晚清新學書目提要》，頁 316。

書局刊行於 1903 年，著者的名字被表記爲「美國醫學博士夫里德力荷歷」。中譯者爲誘民子，其生平不詳，大約是留東學生圈中的人物。此譯本我尚未寓目，它的發售廣告見於當時的報紙或是出版物書後。廣告文特別強調插圖的存在，又說此書內容「美絕快絕」，爲「斯學之絕唱」云云，可以說十分誇張。[75]

《生殖器新書》之外，由「衛生研究社」於宣統元年(1908)刊行的《生殖器之研究》（上、下冊）也是霍立克原著的生理學書。此中譯本內題「美國醫學博士花立克原著，譯述者日本醫士伊沢德，復譯者雲間姚昶緒」，明確顯示其爲日譯本的轉譯。日譯本《生殖器の研究》（求光閣書店刊）出版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其問世後僅僅兩年，即被迅速轉譯爲中文。

與霍立克有關連的作品，另外還有一種亦流傳甚廣。其日文版原題《學理實驗色情衛生　男女の秘密》，作者題爲「ホリック、春夢樓主人譯」（發行人福永捨次郎、1908 年刊）。該書最初的中譯本是光緒三十四年刊《學理實驗色情衛生　男女之秘密》（美國醫學博士霍克立著，日本春夢樓主人、中國鵜湖少年譯述，發行所：外埠各書局、分發行所：改良小說社、鴻文書局）。到了民國後，又出現了「中國衛生研究會」的改訂版。後者題爲《男女之秘密》，曾再版多次（上海圖書館藏其第四版，民國十一年刊）。就內容而言，此書記述日本情況的章節頗多（如〈雞姦爲戰國時之惡風〉、〈新渡戶博士之理論〉等），且有濃厚的獵奇色彩（如〈東

75 松本安子著，誘民子譯，《男女婚姻衛生學：一名　少年男女須知》（橫浜：啓智書会，1902），書後廣告。

西美人之不同〉、〈陰毛之研究〉等），因此可斷定是盜用霍立克名義的僞作。該書在日本出版不久旋被禁止發賣，但其中文版卻呈現大肆蔓延之勢。

除了從日譯本轉譯西方人的著作，還有一些由日本人編纂的造化機論，在清末時亦有翻譯。這一類作品，我想可以舉出三種。一種是細野順纂譯的《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1888)，此書的中譯本據張仲民調查有兩個版本，即《普通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出洋學生編譯所，1902）和《造化機新論》（商務印書館，1903）。顧燮光《譯書經眼錄》卷之五〈全體學第十四〉收入了後者，並評論此書內容與《生殖器新書》略同，「其言胎產、婚配、乳兒各說，甚多至理」。[76] 第二種是《男女生殖健全法》，內題「婦人科專門博士宮田守治閱　產婆松本安子著」，有東京中央看護婦會刊本(1900)。此書的中譯本題爲《男女婚姻衛生學：一名少年男女須知》（日本女醫士松本安子著，誘民子譯），横濱啓智書會刊(1902)。此譯本問世後相當受歡迎，至 1906 年已經發行到第五版。第三種是藤根常吉纂譯《生殖衛生論》（東京：吐鳳堂書店，1899），中譯本則題爲《婚姻進化新論》〔日本藤根常吉撰，無錫丁福同譯，上海文明書局編），最早刊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生殖衛生論》的特色之一，是日本作者使用了當時尚屬新潮的「性愛」概念，這在造化機論類著作中殊爲罕見。不過翻譯者丁福同完全沒有理解該詞的含義，把原書序言中「人間社會之根本者，性愛之外尚有

76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頁 186；顧燮光，《譯書經眼錄》，卷之五〈全體學第十四〉，收入《晚清新學書目提要》，頁 315。

何物耶。然則以性愛爲人間社會之心，豈非不可乎」一句，意譯爲「而人間社會之根本，得其心而心能宰物，與失其心而心爲物制。其得失之間，所關匪淺鮮也」。[77]「性」概念在清末時尚未進入中文世界，此可爲一證。

清末讀書人能接觸到的第三類造化機論，是日本人的漢文編纂本。這類作品似乎只出版過一種，即《男女衛生新論一名　延壽得子法》（上海：新智社，1903），該書內題「清國上海日本博愛醫院院長宮崎德太郎校閱，清國上海日本博愛醫院副院長綿貫與三郎編著」。本木至在《手淫和日本人》中提及此書，認爲手淫有害論的理論背景在日本從基督教的正邪觀轉化爲「大日本帝國的重要訓育意識形態」之後，這部在上海出版的著作便成爲「伸向支那大陸的壓制者之手」。[78] 不過從《申報》廣告可知，該書實際上是上海的出版社「特囑精通華情之日本良醫數名合力編撰」的產物，因此不能忽視中國人在其中的推動作用。[79] 此書中文版未見，我寓目過的是日文版（日本國會圖書館藏），題爲《延壽得子　婦人と男子の衛生》。此日文版內容相當充實，從〈第一章男子生殖器之解剖〉到〈第二十五章論避妊及墮胎〉，凡三百餘頁，並附有插圖 53 幅。其中的一個特別之處，是作者所舉事例中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人的身影。〈第七章結婚之注意事項〉提到上海人高某與其妻琴瑟相和卻多年未育，後蓄一妾，結果當年即舉一男兒。而其妻後來與僕人私通，

[77] 〈生殖衛生論序〉，藤根常吉纂譯，《生殖衛生論》（東京：吐鳳堂書店，1899），頁 1；藤根常吉撰，丁福同譯，《婚姻進化新論》（上海：文明書局，1903），〈緒言〉，頁 1。

[78] 本木至，《オナニーと日本人》，頁 144。

[79] 〈男女衛生新論一名延壽得子法〉，《申報》，1903 年 6 月 30 日。

不久亦生一男兒，於是家庭內部從此起了「大波亂」。綿貫醫生利用這個事例討論夫婦相合與否的問題，他在介紹西人的學說——男女雙方「愛情之不一致」乃是導致不孕的主因——之後，從生理學的角度指出雙方「生殖器之大小形狀不相符合」亦可導致不孕。[80]

流通於清末圖書市場的造化機論類出版物中的最後一類，是中國人自己編寫的通俗讀物。這類編纂本的出現時間意外的早，和上述譯著幾乎同時。可以歸入此類的出版物有兩種，一是《傳種改良問答》，另一是《吾妻鏡》。

森田峻太郎纂《傳種改良問答》，有商務印書館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日本人的造化機論著作群中，找不到森田峻太郎這個名字，因此我極爲懷疑它是留東學生的筆名。這種懷疑的依據，同時也來自下面幾點：一是作者的口吻不似日本人，如書中提到的美洲中國街「穢惡悉仍上海城內」，或是「女人去纏足之累」等話題，皆是彼時中國讀書人的關心所在。二是書中出現的新名詞中，不但有「傳種改良」、「擇種留良」等清末流行語，甚至還有「泡蛋」、「子管」等非日本人發明的生理解剖學名詞。與千葉繁《造化機論》的時代不同，明治二〇年代(1888-)以後的日本已經建立起完整的近代醫學教育體系，造化機論的作者們大都擁有「醫學士」頭銜。因此讓他們使用一個時代以前的、且來自中國的解剖學名詞的可能性極小。在這些新名詞當中，有一個奇特的詞是「生元」。作者森田的解釋是：「男精生於睪丸，藏於精囊，內有動物，形如蝌蚪，名曰生元」。類似論述也見

80 綿貫與三郎，《延壽得子　婦人と男子の衛生》（東京：上海新智社東京分局，1905），頁 73-74。

於下述《吾妻鏡》，不過該詞被寫作「生原」。我推測這個詞的來源可能是細野順《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中的一句，即「精液乃生殖之原素，爲睪丸分泌之白色液體」。[81] 清末的一些讀書人似乎把細野所說的「生殖之原素」誤解爲精蟲的名稱，才使用「生元」或「生原」。

《傳種改良問答》分爲七章（總論、論男女生育期、論婚姻、論交媾、論妊娠、論產、論小兒期），皆以一問一答的形式構成。這或許是受日本的《男女交合得失問答》（武部瀧三郎翻刻，1886）一類作品影響的結果。書中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屬於造化機論中常見的性知識——包括決定夫婦能否琴瑟相合的體質說、情慾的性器還原說和陰陽二電氣說等等——皆有提及。這部作品的一大特色，是有關手淫的論述相當多。書中的〈問手淫之害〉、〈問手淫之遲早〉、〈問東西各國之男女至十三四歲，亦有犯手淫者否〉、〈問中醫治童子虛弱症，何以無一人明言其犯手淫者〉等章節，皆反覆強調手淫導致的恐怖後果，作者甚至聳人聽聞地說：「支那犯手淫而夭折者甚多，惜乎未知此治法也」。[82] 此書的出版，標誌著自提索以來盛行於歐美的手淫有害論，經由日本轉口後，又一次在中國登場了。

另一部由清人撰寫的著作，是江蘇海門人楊翥的《吾妻鏡》（杭州圖書公司刊）。該書有光緒二十七年(1901)自序，但作者友人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中記錄的購買時間是翌年 10 月 30 日，因此該書大致出版於 1902 年前後。關於此

81 森田峻太郎纂，《傳種改良問答》（上海：商務印書館，1901），頁 4；細野順纂譯，《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頁 38。

82 森田峻太郎纂，《傳種改良問答》，頁 7。

書內容、作者情況和社會反響，已經有張仲民論文〈另類的論述——楊翥《吾妻鏡》簡介〉可參考。就該書在通俗性科學傳播系譜中的位置而言，我認爲有以下兩點值得關注。

一是該書的創作背景。楊翥沒有日本留學的經歷，其新學知識皆來自於在杭州日文學堂的學習。這所學堂由日本京都的東本願寺創辦於 1899 年，堂長伊藤賢道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是一個聲稱「以日華洋三學陶鑄育成天下有用人才」的野心家。該學堂的教育內容是把日本中學五年的課程縮爲三年，在籍的學生不但要學習日語，同時也要接受包括生理學、衛生學在內的所謂「普通學」教育。另外，伊藤在醫療方面也十分熱心，不但在校內設立醫療所，甚至還聘請日本女醫來作診療，這在當時的杭州成爲話題。[83] 楊翥撰寫《吾妻鏡》的時期，正好與杭州日文學堂的全盛期重合，因此可以說該書是日本佛教界在華開展近代教育事業的產物。

二是《吾妻鏡》在內容上的偏重。按照作者自序中的說法，這是一本專講「培種之道」的著作。所謂「培種之道」，作者認爲是「治人之學」與「治心之學」之基本。[84] 從這種認識中，不難看到康有爲的影響。此書正文有 38 章之多，但內容均極爲粗略，全文不過六千字左右。與翻譯類出版物明顯不同的一點是，書中涉及生殖器解剖和妊娠生育過程的介紹特別貧乏。作者認爲值得教授讀者的解剖知識，似乎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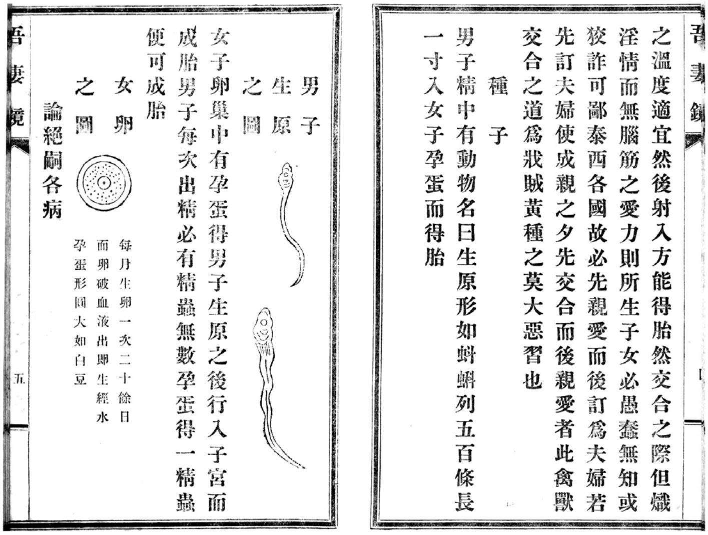
---

83 高西賢正，《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上海：東本願寺上海別院，1937），頁 79-80、313。

84 楊翥在《吾妻鏡》卷首〈自序〉云：「治人之學，治心而已。治心之學，培種而已。是書專講培種之道，惟求辭達，簡而無文。讀者不以其不文而棄之。光緒二十七年中國江蘇海門楊翥序」。參見《吾妻鏡》，（杭州：杭州圖書公司，出版日期不詳）。

有一件事，即人體中存在精子和卵子，其他內容皆被省略了。但就是在少得可憐的知識介紹中，卻還是錯誤百出。如〈種子〉一節云「男子精中有動物，名曰生原，形如蝌蚪，列五百條，長一寸」，簡直到了令人失笑的地步（圖七）。[85]因渴望強種救國而傾心於通俗性科學的清末讀書人當中，眞正能認眞對待解剖學知識的人似乎並不多。

圖七　楊翥《吾妻鏡》（光緒 27 年序）的插圖頁


吾妻鏡

之溫度適宜然後射入方能得胎然交合之際但熾淫情而無腦筋之愛力則所生子女必愚蠢無知或狡詐可鄙泰西各國故必先親愛而後訂爲夫婦若先訂夫婦使成親之夕先交合而後親愛者此禽獸交合之道爲戕賊黃種之莫大惡習也

種子

男子精中有動物名曰生原形如蚪蚪列五百條長一寸入女子孕蛋而得胎

吾妻鏡

男子生原之圖

女子卵巢中有孕蛋得男子生原之後行入子宮而成胎男子每次出精必有精蟲無數孕蛋得一精蟲便可成胎

女卵之圖

每月生卵一次二十餘日而卵破血液出即生經水孕蛋形圓大如白豆

論絕嗣各病

五

不過《吾妻鏡》中也有作者全力推介的知識，這就是電氣說。三種電氣說和陰陽二電氣說在書中同時登場，這在其他著作中極爲罕見。楊翥甚至還斷言「不明電學之理者，不能深知男女相愛之因也」（詳見下節）。總之，這是一部受

85　楊翥，《吾妻鏡》，〈種子〉，頁 5。

到電氣說感染的清末學子所留下的有趣紀錄。[86]

以上的列舉，大致涵蓋了清末通俗性科學的主要著作。不難看出，它們與明治日本的造化機論關係密切。甲午戰爭之後東學開始風行中國，上述出版物可以說是這一時代潮流的最初結晶。就種類而言，雖然總共只有十餘種，但如果考慮到再版、盜版的大量存在以及出版商利用報紙的大肆廣告炒作，其產生的影響實在不可小覷。於是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通俗性科學的傳播到底給中國人的認識帶來了怎樣的變化呢？

四、近代中國知識人和電氣說

按照赤川學對 89 種日文著作的調查，關於造化機論涵蓋的性知識範圍，大致可以歸納爲 12 項，即男女內外生殖器的形態和功能、妊娠出產的過程、情慾淫欲論、夫婦相性、生殖器病、性感染症、手淫之害、過淫之害、早婚之害、股間淫之害、性交技術。[87] 清末雖然只引進了部分造化機論著作，但在當時的文獻中，涉及上述內容的話語（雖然有的僅爲隻言片語）大致也都可以找得到。不過，全面考察通俗性科學的影響，無疑將是一項浩大工作。在本節中，我把考察對象局限爲一項，即作爲性愛基本原理的電氣說。根據赤川

86 《吾妻鏡》的書名來自鎌倉時代的一部日本史書，該書十七世紀中葉傳入中國。楊翥為何借用這三個字作書名，亦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有趣題目。相關的考察可參見唐權，《吾妻鏡の謎　清朝へ渡った明治の性科学》（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4），頁 59-66。

87 赤川学，《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歴史社会学》，頁 91。

的分類，它是情慾淫欲論的一部分。作爲通俗性科學知識群中最富時代特色的一種認知，無論是在日文還是中文的性科學文獻中，皆受人矚目。

電氣說包含兩種不同的學說，即三種電氣說和陰陽二電氣說。前者認爲男女間完美的交媾過程將會發生三種不同的電氣，即人身電氣、舍密電氣（後稱「化學電氣」）和摩擦電氣。而後者則認爲男子帶有陽電，女子帶有陰電，男女之間的交媾實際上就是陰電和陽電發生碰撞的過程，其原理與電池發電並無不同。兩種學說均自 1870 年代即進入日本，在造化機論著作群中被頻繁介紹。不過從清末中國人對待這兩種學說的態度中，卻可看到明顯的差異。

關於三種電氣說，日本文獻中最早和最詳細的論述見於扶德著，千葉繁譯述的《通俗造化機論二編》(1877)。在〈論交合之快樂基於電氣〉一節中，扶德強調男女「合歡共樂之時可發三種電氣，而單身獨樂之時惟發一種電氣」，後者令神經疲勞太甚，因此「交合與手淫的利害損益之區分全在此一事」。[88] 依據三種電氣能否同時發動來區分各種性行爲優劣的論調，在明治前期的造化論中十分常見。不過到了明治中期以後，這種論調已經有了微妙變化。論者經常只有在解釋某一特殊的性現象時，才會讓電氣說突然登場。如細野順在《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中，雖然很忠實地介紹了三種電氣說的內容，但僅用該理論來解釋股間淫之害。

《通俗造化機論二編》在清末通俗性科學的文獻裡未被

88 千葉繁譯述的《通俗造化機論二編》（稻田佐兵衛刊，1877）。復刻版收入斉藤光解說，《近代日本のセクシュアリティ　第一巻　通俗性欲学以前》（東京：ゆまに書房，2006），頁 32。

提及，當時的中國知識人似乎不知道該書的存在。在包含三種電氣說說明文字的著作中，被翻譯成中文的只有前述細野順纂譯的《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而清末知識人中主動介紹這一學說的，就我所知只有楊翥。在《吾妻鏡》的〈論男女相愛即磁石之理〉一節中，他有如下說明。

> 吸鐵石因電氣有陰陽而相吸，男女亦因電氣而相吸。其交合時生電氣三種：一摩擦電，即摩擦而生；一酸鹼電，即男女精中二味製成；一化合電，即二物化合而生。電氣有濃淡，愛力亦因之而濃淡。電浪有大小，快味亦因之而大小。電之至數有遲速，呼息因之而遲速。不明電理者，不能深知男女相愛之因也。

上面出現的「摩擦電」、「酸鹼電」、「化合電」，根據文中解釋來理解的話，應分別對應日文中的「摩擦電氣」、「化學電氣」、「人身電氣」。值得注意的是，楊的興趣僅僅局限於三種電氣的名稱，緊跟在後面的「電氣有濃淡」、「電浪有大小」云云，實際上都不是三種電氣說中的常套話語。同時由三種電氣說推導出來的各種性行爲優劣排行以及一種電氣傷身之事，他也都沒有提及。

相比之下，陰陽二電氣說在中國似乎受到了更多的青睞。提倡此學說的重要著作，正是在日本和在中國均流傳甚廣的《男女交合新論》。在該書〈交媾須用全身之力〉一節中，作者法烏羅提到了陰陽二電氣說的原理。憂亞子的譯文如下：

> 交媾時男女兩性之電氣（男為陽電，女為陰電）必互接而底於均平，與用器發電無以異也。然人之電氣隨各人而多少，或倍焉或十倍焉。至交媾時，有增進一

倍之勢者，有增進十倍之勢者。[89]

引文中「男女兩性之電氣」爲誤譯，日文原文說的是男女互帶「反性的電氣」。陰陽二電氣說之不同於三種電氣說，除了強調男女所帶電氣性質相反，還有一點就是重視電氣的發生數量。電量當然是越大越強越好，因爲這對懷胎起著決定作用。在該書最後一節（〈妊娠說〉）中，法烏羅告訴讀者女子能否懷孕取決於兩個條件，一是子宮的吸引力，一是電氣的引力。關於後者，他強調說「生命因電氣而生，故男女之電氣充足，精蟲卵種自能凝合」。[90]

法烏羅的上述學說，在清末的其他通俗性科學著作中不斷被重複和敷衍。如森田峻太郎在《傳種改良問答》中先是驚嘆「人之牝牡生殖器，蘊蓄陰陽二電。其互換之神妙，不可思議」。後在回答行房之益時，又說「男有陽電，女有陰電，陰陽二電互相補益。故合宜之交媾，務令電氣不致空散，均平而各得其所。則男女之身心，皆得壯強補益，而不致倦勞損害。故男子爽敏之腦力每生於閨房之行樂，古今豪傑英邁之士之劇使心神也，必行房一次，以養成其氣力。（中略）女子亦然，交媾之後，容受精液與陽電，故身益強健而元氣

89 法烏羅著，憂亞子譯，《男女交合秘要新論》（該書封面題《男女新法衛生秘要新論》，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17。

90 此處譯文與原文內容略有出入。原文為「抑生命は陰陽電気の力に因て生ずる者にして。男女の愛情より孕胎に至る迄。尽く其力に出ざる者なし。」（抑生命出於陰陽電氣之力，自男女之愛情至成孕懷胎，無不依賴其力者），參見発烏羅著，橋爪貫一抄譯，《男女交合新論》，頁 57-58。本文使用的版本《男女交合秘要新論》（上海圖書館藏）因該部分已殘缺，這裡的引用來自無出版地無出版時間的海盜版《男女衛生交歡論》，頁 12。

愈充」。[91] 楊翥在《吾妻鏡》中也說「夫男女交合，陰陽兩電互相流通，故有益無損。彼娼樓婦女，交合多而電氣淡，閱人多而愛力薄，男子盛欲以交合，必得不償失」。[92] 楊儘管也介紹了三種電氣說，但在論及諸多具體問題——如男女私奔的原因、夫婦關係之能否和諧、多淫之害、夫婦以外的性行爲（股淫、手淫、買春、強姦、夢遺、留精）之害、聰明者好色的理由、女性「外交」（與異性交往）的正當性、股間淫之害、結婚年齡的選擇——的時候，毫無例外地用電氣之有無以及電量之濃淡強弱作爲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簡言之，楊翥在《吾妻鏡》中對陰陽二電氣說的適用範圍說作了最大限度的擴展。

對於清末人來說，把陰陽二電氣說作爲一種認識工具加以吸收，其意義當然不限於求知慾和好奇心的滿足。因爲通過這種學說，似乎能發現中國人羸弱的根源。不難想像，「陰電」、「陽電」之類的新名詞自然也會出現在清末知識人的社會改造言論裡。蔡元培(1868-1940)曾作過一段洋洋灑灑的論述，堪稱「保國保種」文脈下活用這一學說的典型事例。

> 而體交之事，限於男與女者何也？曰男子之慾，陽電也；女子之慾，陰電也。電理同則相驅，異則相吸。其相驅也，妨於其體也大矣；其相吸也，益於其體也厚矣。相吸之益，極之生子，而關乎保家，且與保國保種之事相關矣。然而，異電之相吸也，必有擇焉，何則？凡體者，皆合眾質點而成者也。一體有一體之

[91] 森田峻太郎纂，《傳種改良問答》，頁 1、12。

[92] 楊翥，《吾妻鏡》，〈論股淫手淫宿娼強姦夢遺留精等同一害身之事〉，頁 9。

> 性質，雖析之極微，而一點之性質與一體同，此人與物之公例也。是故其體有強弱之差者，其所發電力有多寡久暫之差；其神志有智愚之差者，其所發電以成器之性，亦有靈蠢之差，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中略）是故男女質性不同者，其所生子亦與之為不同，及其所生子之生子也，又有不同矣。烏呼，此人之所以同種而漸趨於異者也。且也，駁性所生之子，其神志不完全矣，甚者，體魄亦不完全也。烏呼！體魄不完全，具耳目者皆知之；神志不完全，則我國所素不講，而孰知夫弱國弱種之胥由於此也乎！[93]

上面這段引文見於〈夫婦公約〉一文。原文爲手稿，《蔡元培全集》編纂者將寫作時間推定爲 1900 年 3 月。此時中文的通俗性科學出版物尚未問世，則蔡的電氣說知識可能直接獲取自日文原著。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這篇文章的創作時間應當稍晚一些。不管是哪種情況，有一點是無疑的，那就是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陰陽二電氣說對許多讀書人——哪怕是頭腦睿智的學者——都是極富吸引力的。

不只是蔡元培及嚮往新學的人士，對於稍微保守一些的讀書人來說，電氣說也同樣有吸引力。在這方面，孫寶瑄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孫雖然廣泛涉獵新學，但同時也篤信佛學，因此新學知識和宗教信仰在他的頭腦裡呈現出一種互不排斥的共生狀態。例如，生理學中關於精子和卵子的知識，在他看來不過是重複了天台宗教義裡的胎發生論。[94] 對於電

---

93 蔡元培，〈夫婦公約〉，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卷 1，頁 102。

94 孫寶瑄云：「凡男女媾精，精中有微生物曰精蟲，此近日全體學大明，

氣說，孫也並沒有像蔡元培那樣，從強種保種的角度考慮，而是企圖把它融入到既有的認知中。在 1903 年的一篇日記中，他記錄了自己的如下心得：

> 人，陽也；鬼，陰也。人之中又分陰陽。男，陽也；女，陰也。男女交感而成孕。然當男女交感之時，即人鬼交感之時，是以有轉輪投胎之説也。人鬼何以交感？曰：天地凡相反之物，每相吸合。觀於男女相悅，由陰陽二電之相感而知之矣。陰不能包陰而能感陽，陽不能感陽而能感陰，彼人鬼亦猶是也。唯人鬼交合而結胎，而成人。故人為半陰半陽之質。[95]

這裡值得注意之處，一是生死輪迴觀念與陰陽二電氣說在文中並置，作者把它們都看作是解釋世界和人的存在狀態的理論依據，二者並無高下。二是陰陽二字在行文中的含義，既在傳統思想的層面上被使用，同時也混入了法烏羅的電氣概念（孫曾經在理文軒購買過《男女交合新論》的中譯本）。孫的這段日記，暗示了電氣說流行的一個原因，即該學說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親和性。

這種親和性不僅表現「陰」和「陽」的概念上，就是「電氣」這個詞本身，在清末讀書人聽來，也有不同於今天的獨特迴響。「電氣」概念之被介紹到中國，就我所知，始於合信的自然科學入門書《博物新編》（初版 1855 年）。該書的初集有一節題爲〈電氣論〉，作者是這樣向中國讀者介紹

為人所恒言。而佛書中已先有之，《大論》云，身內欲蟲，人和合時，男蟲白精如涙而出，女蟲赤精如吐而出，骨髓膏流，令此二蟲吐涙而出」。見《忘山廬日記》，上冊，壬寅年(1902)三月十三日條，頁 503。

95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癸卯(1903)年四月十五日條，頁 678。

這種神奇之物的。

> 大地之體有氣，曰電。雜賦於流形之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與生氣絕不同類，聚則為電為火，靜則散藏於密，其本原之質，內具陰陽二性陰陽者非牝牡雌雄之義，得造化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若器物之中，一為孤雌，一為獨陽，則陰者必合於陽，陽者必合於陰，務必彼此會合，一氣調和。[96]

這段說明的知識背景，當是電氣流體說。在電子被發現之前，這是西方人對電氣的一般認識（電氣流體說又分爲二流體說和一流體說，法烏羅的陰陽二電氣說當敷衍自前者）。不過，讀到這段文字的清末讀書人會怎麼理解呢？大約只會把「電氣」直接想像成中國哲學中的「氣」吧。電氣的出現，曾給清末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巨大變化，也給當時的思索者帶來無限驚奇和遐想。在他們眼中，電氣不但是擁有無限可能性的新能源，更是帶有本源性和靈性的神奇物質。如譚嗣同在《仁學》中說「以太」就是「電」、就是「愛力」，又說「腦爲有形質之電」，「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也」。如果追根溯源的話，這種電氣觀當來自合信「大地之體有氣曰電」的說明。[97] 對於原本就以「三至」、「五至」等各種「氣」的運行來解釋性愛原理的中國人來說，接受陰陽二電氣說幾乎無所障礙。

在日本，隨著明治時代的結束，三種電氣說和陰陽二電

---

96 合信，《博物新編》（東京：老皂館，1874），頁 50。

97 譚嗣同著，印永清評註，《仁學》，頁 73、84。關於清末人眼中的電氣和以太，中國文學研究者武田雅哉有極為精彩的分析，見氏著，《桃園郷の機械学》，頁 274-287。

氣說也迅速銷聲匿跡。箇中的緣由，一方面是因爲日本官憲的壓制，如前所述，大正初年造化機論類著作全部被劃爲了禁書。不過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號稱「性慾三劍客」的羽太鋭治(1878-1929)、澤田順次郎(1863-1944)和田中香涯(1874-1944)在明治末年崛起，開創了大正時期以「性慾」話語爲中心的所謂「普通性慾學」時代。在兩方夾擊下，造化機論很快退出了日本人視野。

中國在進入民國以後，性科學的傳播則呈現一派混沌局面。一方面，接受過近代高等教育的知識人開始自西方直接引進性科學專著，《結婚的愛》及《性心理學》等著作的介紹和翻譯，可以說是這一時期的成果。另一方面，來自日本的影響依然強大。不過引進對象已經不再是造化機論，而換成了「通俗性慾學」方面的著作和文章。[98] 與日本不同的是，通俗性科學在民國時期雖然已經變得陳腐，但在很長時期內卻沒有從中國人的視野中完全消逝。所以就性知識的流通而言，民國時期可以說是諸說雜陳的時代。

民國以後依然推崇電氣說的人物，無疑首推張競生。還

98 以羽太鋭治為例，他除了有〈新馬爾薩斯主義與性的道德〉〔《婦女雜誌》，卷 7 期 7(1921)，幼雄譯〕等多篇論文被翻譯成中文並刊登在國內雜誌上，涉及性慾學的專著也至少有兩種在國內翻譯出版，其中一種是《性慾教育之研究》(1923)。《性史》第二集收入的志霄女士自傳〈我的性經歷〉後面的編者按語中，有對該書的大量引用和介紹。參見張競生編著，《性史 1926》（臺北：大辣出版公司，2005），頁 207-211。另一種是收入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的一之譯，《性愛研究》（新宇宙書店，1928）。另外，根據實藤惠秀監修，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可知他還有兩部著作也在民國年間翻譯出版。這兩部著作分別是黃孤颿譯，《身之肥瘦法》（上海：啟智書局，1945 年前版）和式隱譯，《避妊要領》（上海，1945 年前版）。

是在北京大學教授美學的時代，他就把「閨房術」作爲「美的體育」中的一環，強調「生殖器運動時則一切官骸皆發電氣的作用」。而男女交合之所以是「周身最精微、最完全、最快樂的運動」，也是因爲「細至一毛一髮也生了電氣在那裡顫動」的緣故。[99] 在《性史》一書中，張氏讓電氣說再次登場，並以之爲評價男子間性行爲的價值尺牘。

> 我們常看了許多書及聽了許多人的話說：謂男子喜男性，因為屁股比陰戶緊扣，這個可見陰戶鬆弛是間接助長好男色的原因。但屁股的臭屎味，又無多大的活動力與各種電氣，斷不能與陰戶的稍具有生氣者比賽。故請閱者注意，把陰戶講究得好，不但男女得到交合的和諧，並且可以鏟除這個變態的、臭味的、無意義的、非人道的、甚至鳥獸所不為的後庭把戲。[100]

在張氏的眼裡，男性間的性行爲之所以令人不齒，原因之一在於不能發出「各種電氣」。如前所述，這種論調正是三種電氣說的常套。從這裡的記述來看，張競生對該學說有相當的了解。

有點巧合的是，與上一輩的電氣說鼓吹者楊翥一樣，張競生眞正推崇的其實也不是三種電氣說，而是陰陽二電氣說。他寫過一篇相當長的文章，題爲〈第三種水與卵珠及生機的電和優種的關係〉（又名：「美的性欲」），登載於張氏離開北京大學後在上海主編的《新文化》雜誌第一卷第二期(1927)上。如題目所示，作者把「生機的電」和其自創的「第三種水」並列，顯示其重視程度。「生機的電」四字未

---

[99] 張競生，《美的人生觀》，頁 41-42。

[100] 張競生編著，《性史 1926》，頁 110-111。

見其他著作，我頗懷疑這也是作者本人所自創的。關於「生機的電」的詳細解說出現在該文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在介紹完「第三種水」的種種妙用以後，作者用饒舌的筆調把讀者帶入了一個奇妙的電氣世界。

> 大凡交媾時，男器覺得美妙處，在陰道的收縮靈動，與有電氣。……（中略）但其最妙處乃在將丟之際，覺得陰內熱氣密佈，此時陰道內變為「電氣的區域」。大凡熱就生電，熱為電的母，電為熱的子。但女子此時所生的電為陰電，與男子的陽電互相吸引。此時男女似合成為一氣不能分開，即是兩電流互相溝合的緣故。又普通的陰戶，尤其是生過子及稍年老者，都犯鬆放之病，在發生電之時，不但不會鬆放，而且覺得甚緊湊，因為電氣烘乾壁膜與吸引陽電的緣故。
>
> 至於第三種水丟時的妙處更難言了。平常女子不過女子耳，此時伊是電化的仙人了。伊此時不但自己發電，並且授男子以電。也如男子射精，同時自己發電，同時給與女子以電一樣，這確是「電」的問題。最妙處這不是物理化學無機物的電，乃是生理的有生機的電。此種電的作用甚大。他能把身體與精神變為活潑潑地有生氣。這樣電化的結果，其身體和精神甚好。[101]

張競生的電氣談義在這裡如洪水般滔滔而下，《新文化》當期雜誌中從第 35 頁一直持續到第 48 頁，讀來幾令人頭痛。就篇幅長度而言，惟有《通俗造化機論二編》中扶德關於三種電氣說的介紹可與之媲美。張氏對於「生機的電」的

---

101 張競生，〈第三種水與卵珠及生機的電和優種的關係。又名：美的性欲〉，《新文化》，卷 1 期 2（1927 年 2 月），頁 35-36。

認識，大致可總結爲以下四點。

首先，關於男女之間的性行爲，都可以用「電」的原理來闡釋。如引文所示，張氏十分忠實於陰陽二電氣說。他認爲男子的陰莖就像「電杼」，需要全力撥動女子的「電盤」始能「發電」。依靠性的接觸而產生的電氣被張氏命名爲「慾電」，於是男子之精與女子之第三種水自然就都變成「慾電的一種排泄物」。至於愛人之間握手或是目光交錯也是發電行爲，不過那是電浪在空中傳達的「無線電」了。

其次，通過「電化的交媾法」所產生的電氣，對於男女雙方的身心皆極爲有益。這本來也不是什麼新學說，張氏的獨到之處，一是發明了一個新名詞「電益」，來專門指稱這種益處；二是用傳統房中術裡的陰陽採補觀念來比附電氣說，他告訴讀者，只要能發動電氣即可帶來相當於「採陰與採陽」的功效。

再次，「生機的電」和優種息息相關。按照張氏的說法，在男射精女出第三種水的狀態下——也就是在男女「全身最電化的時候」，雙方的電氣對流，「每每傳給卵珠及精蟲一些電氣，當這兩物聚合之後即發生電氣吸推現象，故胎孩的強壯與父母發電的大小也有關係」。

最後，要使「生機的電」達到「最高等的度數」，男女需要從「情愛」和「美感」二事著力。這一方面是因爲「有情愛的兩性能產生極大的電力」，同時也因爲男女在作「電的接觸」時，只有彼此讓對方感受自己的美感，才能做到「平時衝動與臨時起勁」。

這篇論文最後的結論，自然是「電化的性交之作用大矣哉，第三種水之作用大矣哉」。作者在正文之後還特意添加

了數行附言，告訴讀者該文已經作爲「性慾叢談」之一出了單行本，零售一角。同時他本人還準備把這篇力作「擬譯爲外國文，以便各國性學家商榷，而使他們知道中國人對此重要問題，也有相當的發見」。雖然張氏自得之情溢於言表，不過細究其中的知識背景，可知其主張基本不離妊娠的性高潮必要說和陰陽二電氣說。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超出十九世紀性科學的範圍。張氏有在歐洲長期留學並取得學位的經歷，除了身邊唾手可得的清末通俗性科學書，他直接自西文著作——譬如十九世紀的新婚夫婦指南類書籍——獲取靈感的可能性更大。其大膽露骨的筆觸以及《新文化》雜誌中喜用裸女插圖的版面設計（圖八），都令人聯想到善亞頓的《自然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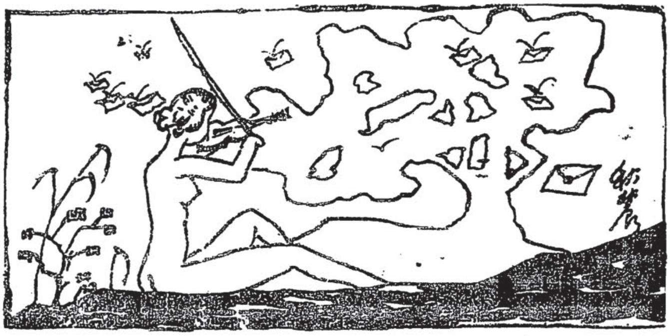
1927 年是張競生創作最旺盛的時期，共留下了約三十篇文章。其中詳述其性學觀點的作品有兩篇，除了〈第三種水與卵珠及生機的電和優種的關係〉（又名：「美的性欲」），還有一篇題爲〈性部呼吸！〉（續編改題爲〈性部與丹田呼吸〉）。兩篇長文甫一問世，即遭到了各方的口誅筆伐。如周作人批評張氏已墮落爲「道教的採補家」，潘光旦(1899-1967)等人則痛斥第三種水之說違背生理學常識。潘氏另外還諷刺張氏根本沒有優生學的智識，卻奢談優生方法，「眞是大惑」。[102] 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這些正面批判的嚴肅文字

---

[102] 周作人，〈時運的說明〉，收入周作人著，鐘叔河編，《上下身：性學‧兒童‧婦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頁 177；光旦，〈《新文化》與假科學——駁張競生〉，《性雜誌》，期 2(1927)，頁 8。與潘光旦持同樣立場的批判文章，就我所知還有以下兩篇：周懌昭，〈評張競生博士的所謂美的性慾的前半部——即第三種水與卵珠……的關係〉，載《新女性》，卷 2 期 5(1927)，頁 543-552；倩倩，

圖八　張競生主編，《新文化》雜誌的版面

—競　生　先　生—　(73)



(性　育　通　訊　欄)

競生先生

羅澳

貴刊第二期「第三種水」一文，殊有價值。我看　先生的雜文，總算這篇最好了。不過我對於　先生平素所主張「多情玩而少交媾」的道理完全贊成，而這回　先生主張電化的交媾法。竟說，『在少射精與第三種水而在多發出自己的性電及在多得對方人的性電，故男女可常常交接生殖器……』按此，似乎以『不射精的交媾』為「情玩」之一種，或者竟是健身之一法，此理殊難索解。第一，我要問這種電化的交媾法是否與平常健身的『上電氣』一樣，第二。常常交接生殖器，促之發電恐於括約筋不無妨礙。第三。我尤所懷疑的。就是，明明是一種交媾過程，射精為有害而不射精倒是有益了！這種取巧的辦法，於邏輯上實在說不過去請　先生解釋一下。

《新文化》，卷 1 期 4(1927)。

〈第三種水的研究〉，《性雜誌》，期 2(1927)，頁 1-12。

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全都避開「生機的電」不談。張的論敵們到底認爲陰陽二電氣說荒謬到不值一提，抑或因其他原因而避談，其中的機微頗有考察餘地。[103]

當然，攻擊「生機的電」的文字，在當時也不是沒有出現。如下面的文章就是一個例子：

> 其中最荒謬絕倫的要算男女生殖器的電氣了，他老先生說，當交媾的時候，女子生殖器能發生陰電，男子生殖器能發生陽電，哈哈，虧他想得出，附會得上，我想他很深切的中了中國舊時男為陽女為陰的謬說，就硬把電氣上加以陰陽等冠詞了。可惜張先生讀得太多了，連最簡單的發電原理都沒有明白呀！你交媾時，你既然知道有水分排出的——而且有阿大阿二阿三阿四等兄弟般的名稱——那麼試問電氣在物體潮濕時候可以摩擦出來嗎？除非你老先生的陽具像琥珀棒一樣，你家夫人的腟像乾貓皮一樣，纔得發生電氣，纔得使金箔驗電器來證明，果能照你這樣講，現在大家正愁電氣廠罷工的時候，請你和你的夫人到電器公司代替那模和透平機，他們正歡迎著你呢。[104]

---

103 如張競生論敵之一的周建人早在 1922 年時也曾撰文宣傳電氣說，與張氏後來的主張頗相呼應。周氏引英國人貝爾(C.E. Pell)的學說，云兩性細胞中的電力有「零」、「電氣高緊張」以及「最高緊張」之分，又云兩性的生育能力隨電氣的緊張的程度歷級而增，直到生育力最富之度為止。甚至還借貝爾之口說，如果搞清電氣與受精的奧理，其功之偉大，「連該撒與拿破崙的成績便算不得什麼了」。建人，〈電氣生理學與生殖〉，《東方雜誌》，卷 19 號 1(1922)，頁 111-112。

104 瀚，〈嗚呼！張競生的卵珠！〉，性學研究社《性雜誌》，期 1（1927 年 5 月 1 日），影印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 58》（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印中心，2006），頁 28572-28573。

這段引文來自題爲〈嗚呼！張競生的卵珠！〉的短評，登載於性學研究社編《性雜誌》第一期(1927)，作者的名字在正文中沒有出現（在目次中被記載爲「瀚」）。從內容來看，這位身分不詳的作者既不知道陰陽二電氣說是清末時的舶來品，似乎也不了解動物體內存在電氣的生理學常識。而且語近謾罵，文字格調卑下。以後世眼光觀之，「瀚」的批評其實缺乏說服力。不過這篇短評倒是暗示了另一個事實，即1920 年代後期國內的性學論壇上，完全不知道電氣說爲何物的論客已經登場了。

電氣說最終何時從中國人的視野中消失？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找到最終答案。張競生於 1929 年再度遊歷法國，回國後偃旗息鼓，以一介地方文人終世。以我的寡聞，1930年代以後的國內論壇上似乎再也沒有人公開主張電氣說了。不過在魯少飛(1903-1995)主編《時代漫畫》第九期（1934年 9 月 20 日發行）中，有一幅題爲〈電流一縷繫住心兒兩片〉的漫畫（圖九），卻令人有久違之感。作者林競志給這幅作品添加了下面的文字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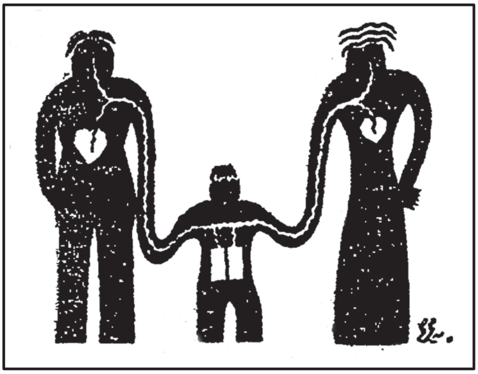
> 異性相遇，電流施放，吸引而眷屬成焉。然物極必反，久之，熱者冷矣，於是有賴乎儲電池傳布之力。[105]

漫畫作者的意圖，似乎是揶揄男女愛情之短暫。不過，把兩性情感的發生描述爲人體內「電流施放」的結果，則顯示陰陽二電氣說的幽靈依舊還在徘徊。在性科學傳播史上，這張諷刺畫也許算得上是該學說留在國人心中最後的殘像吧。

---

[105] 林競志畫〈電流一縷繫住心兒兩片〉，收入魯少飛主編，《時代漫畫》期 9（1934 年 9 月 20 日）。引自沈建中編《時代漫畫　上》（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13。感謝彭小妍教授告訴我此漫畫的出處。

圖九　林競志畫，〈電流一縷繫住心兒兩片〉



原載《時代漫畫》，期 9（1934 年 9 月），引自沈建中編，《時代漫畫上》，頁 113。

結　語

西方性科學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傳播，是一個曲折悠長的故事。從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有三代知識人先後登場，每一代人中流行的性知識各有不同。在最早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中，如王韜等人儘管對西學已經多有接觸和了解，但沒有紀錄顯示他們的關心已延伸到西方的性知識。相比之下，經歷過甲午戰爭衝擊的第二代人則完全不同，在康有爲、譚嗣同等人爲未來中國勾畫的藍圖中，涉及性的新學知識已經占有一席之地。二十世紀初的國內圖書市場上，面向一般讀者的生理學啓蒙書籍接連問世。這些書儘管沒有使用「性」這個漢字符號，但主要內容皆圍繞生殖器構造、婚姻關係、男女交合原理乃至生殖器病等話題展開。在本文

中，我把出現在這類書籍中的知識群統稱爲「通俗性科學」。進入民國以後，隨著執五四新文化運動牛耳的第三代知識人登上論壇，他們開始直接閱讀西文的性科學書並使用諸如「性慾」、「性道德」等新概念。儘管如此，清末通俗性科學中一些特有的性知識，在民國時期仍然沒有完全喪失影響力。

本文主要目的是追尋通俗性科學自日本輸入中國的傳播軌跡。其受到國人矚目的契機，是甲午戰爭以後籠罩在讀書人群中的強烈思變情緒。在「改造人作爲改造一切的基礎」這一理念的驅使之下，[106] 通俗性科學被宣傳爲有益於強種強國的新知，相關書籍的出版一時有氾濫之勢。這種情形的出現，原因大致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清末知識人的幻視。他們根據一些片斷的資訊，把通俗性科學理解爲「心靈學之本」和「治學之始」，希望利用其來改良社會和個人。二是合法性的獲得。通俗性科學的書籍中雖然有「美絕快絕」的文字與插圖，但清朝官憲事實上並未阻撓和壓制其出版發行。同時，在傳種改良的口號以及一系列充滿科學色彩的新名詞的魅惑下，擁有和閱讀這些書籍，在當時成爲一種時髦。在清末的文學作品中，關於這方面的情形有生動描寫。如蹉跎子在小說《最新女界鬼域記》中描寫道，自《男女新交合論》（一個影射法烏羅《男女交合新論》的書名）出版後，「海內外新舊兩派一體特別歡迎」，而上海的租界裡更是出現了「幾位有名望的美男秀女，那個不人手一書」的情形。[107] 與

106 黃金麟，《身體・歷史・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36。

107 蹉跎子，《最新女界鬼域記》，第四回。轉引自張仲民，《出版與文

此相關連，第三個原因則來自商業利潤的驅動。「上海所賣新翻東文書，猥聚如糞壞。但立新名於報端，作數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間，便得利市三倍」。嚴復(1854-1921)在 1902 年的觀察，可以讓我們了解通俗性科學的書籍氾濫及盜版橫行的背景。[108]

清末通俗性科學的直接源頭，是明治時期風靡日本社會的造化機論。不過本文中我亦指出，初期的造化機論著作與來華傳教士的漢譯醫書關係密切。在千葉繁的譯著中，一些解剖學術語如「外腎」、「陰經」等語彙的使用，乃至「造化機」一詞的發明，都可以看到合信《全體新論》的影響。因此中日之間圍繞通俗性科學的交流並非單向的，而是存在著知識的往還。

本項研究還顯示，在康有爲等維新派人士的提倡之下，清末的知識人以多種方式——日文版的直接閱讀、日文版的翻譯、請日本醫生用漢文編纂，以及中國人自己的編寫——積極引進和吸收了造化機論中的知識。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人試圖去把握造化機論的來龍去脈，也沒有人去認眞鑑別其內容上的良莠，這使得造化機論的引進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具體來說，就是引進對象多是日本明治中後期的坊間流行讀物，其中甚至有《男女交合無上之快樂》、《男女之祕密》之類的戲作和僞作。對於造化機論中有代表性的嚴肅著作（如千葉繁的譯著系列），清末的知識人反而從未加以關注。

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頁 251。

108 1902 年嚴復致熊季廉信，轉引自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107。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知識人在引進造化機論的過程中，表現出相當明確的取捨態度。造化機論中有不少涉及基督教性道德的話語，如對上帝造人的讚美以及對一夫一婦制的擁護。但在中文譯著中，這種基督教色彩基本上都被抹去。清末通俗性科學的譯者或作者中，使用筆名的人不少，如憂亞子、誘民子、森田峻太郎、中國鵝湖少年等。從這些名字來看，其主人似乎並沒有近代醫學的專業背景（只有《生殖器新書》譯者之一的仇光裕算得上例外，他是中文作者中惟一被稱爲「明於西國醫理」的人）。因此不難理解，有關生殖器的生理學知識在一些著作中有被輕視的傾向，且錯誤百出。反倒是那些帶有濃厚思辨色彩的學說，如手淫有害說、決定夫婦和睦與否的體質說，以及作爲性愛原理的電氣說等，受到了介紹者們的推重。

通俗性科學的著作在清末時曾被廣泛閱讀，其影響不可小覷。一方面，這些著作中的新知識取代了以「氣」及「三至」、「五至」等概念來解釋性愛及生殖原理的傳統認識，成爲了主流知識。李伯元的小說《文明小史》（成書於 1903-1905 年）第十九回中，描寫一個趨新人士姚文通因爲家鄉的妻子難產，趕緊在上海購買《傳種改良新法》、《育兒與衛生》等書，「帶了回去，以作指南之助，免爲庸醫舊法所誤」。[109] 在姚文通眼中，「舊法」和「庸醫」並列，已成爲該拋棄的對象。李伯元的這段描寫，可以說正反映了性知識發生更替的清末世相。不過，細究時人的記述，則不難看出通俗性科學之所以受新舊兩派的一體歡迎，其中關鍵是其內容顯然與

109 李伯元著，熊飛校勘，《文明小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57。

傳統認識之間存在著親和性。在孫寶瑄等人的眼中，電氣之陰陽兩極與中國人精神世界中的陰陽觀念、生理學中的精子卵子與佛經中的「身內欲蟲」並無本質不同。我想這種親和性亦是通俗性科學未受官憲打壓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黃克武曾論及的清末「新語戰爭」——即和製漢語與和其他譯語的競賽——在通俗性科學的領域亦有展開。隨著造化機論的引進，日本人發明的解剖學用語被原封不動地引進，並開始在國內流行，最終驅逐並替代了來華醫學傳教士所著解剖學著作中的許多語彙。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如合信使用過的「外腎」和德貞使用過的「陽生具」（均指男子的生殖器）、柯為良使用過的「陰莖」（此為 clitoris 的對譯語），在現代中文裡已經完全成為死語。不僅是傳教士發明的語彙多被廢棄，就是像「卵子」這樣漢語中原有的俗語，今天還有多少人知道其本意是指男子胯間的物件呢？

最後，通俗性科學流行所帶來的影響，也波及到傳統學術的世界。典型的事例是葉德輝(1864-1927)出版《雙梅景闇叢書》(1903)。葉氏在該叢書收入了多種古代中國的房中書，如《素女經》、《洞玄子》等。這些在國內久已散逸的古文獻，輯自一部日本平安時代的醫書《醫心方》。該書通過楊守敬(1839-1915)的介紹，在十九世紀末始為國人所知，故葉氏的工作自然有保存國故的意義。不過，從〈新刊素女經序〉中可知，葉氏費力輯書的眞正動機實際上來自通俗性科學書籍的刺激。[110] 正如造化機論的氾濫曾激發明治時期的日本

[110] 葉德輝在〈新刊素女經序〉中云：「今遠西言衛生者，皆於飲食男女之故推究隱微，譯出新書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論、婚姻衛生學，無知之夫詫為鴻寶。殊不知中國聖帝神君之胄，此學已講求於四千年以

人去重新發現江戶時期養生著作的價值一樣，《生殖器新書》、《男女交合新論》等通俗性科學書的流行，也促使清末的一些知識人開始思考固有的房中理論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

造化機論在日本由於有官憲的取締和學者的駁斥，其從盛到衰的過程十分清晰。相比之下，通俗性科學在中國的傳播軌跡，特別是其最終淡出國人視野的經過，則依然模糊不清。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其影響並不限於清末，而是波及到了民國。由於內容的駁雜，因此必須針對通俗性科學中的每一項內容學作分別的深入考察，才可能了解其全貌。本文僅僅追蹤了電氣說在清末和民國年間的傳播軌跡，至於說到手淫有害說、決定婚姻成敗的體質說，以及關於生殖器的病理等其他性知識話語，在同一時期是如何被國人理解和接受的，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通俗性科學話語中生命力最長久的部分，大約是其中的生理學知識。從《申報》上的醫藥廣告可知，即使在張競生退出論壇之後的很長時期裡，「霍立克」這個名字依然在中文讀者中享有號召力。從 1928 年到 1942 年，上海的百靈藥社曾先後發售「眞空療腎機」、「眞空水治器」等號稱包治男子一切生殖器病的神奇儀器。在該社的廣告文中，這些儀器被介紹爲「美國醫科大學生殖器科學長醫學博士霍立克」

前，即緯書所載孔子閉房記一書。……」〔清〕葉德輝撰輯，《雙梅景闇叢書》（長沙：葉德輝刊印，1903)。這裡提到的三種著作，當是霍立克的《生殖器新書》、法烏羅的《男女交合新論》和松本安子的《男女婚姻衛生學》。關於葉德輝及其《雙梅景闇叢書》與日本的關係，深澤一幸在論文〈葉德輝の「双梅景闇叢書」をめぐって〉（《言語文化研究》，号 38（2012 年 3 月），頁 67-91）中有深入考察。

的發明。[111] 如果《生殖器新書》或是《生殖器之研究》等刊行於清末的著作已經過時且無人閱讀的話，上海的商賈大概也不會借用這個名字大作廣告。甚至在抗戰勝利以後，霍立克的名字也依然出現在報刊之中。在一份充滿獵奇內容的上海娛樂小報《香雪海》中，即有〈兩性醫學講座（節錄美國霍立克著生殖器學）〉的連載。我只看到過該連載的第四部分〈女子外陰部〉，內容爲介紹女子割禮習俗。這篇文章刊登於《香雪海》革新第 17 期，發行時間爲 1947 年 6 月 10 日。此時距離《生殖器新書》中文版的刊行已有近半個世紀之久，而兩年之後，中國社會就邁入「禁慾反性」的新時代了。[112]

111 〈真空療腎機〉，《申報》，1928 年 10 月 24 日。

112 「禁慾反性」是李銀河考察新中國性話語後作出的概括，見氏著，《新中國性話語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頁 333。

附　記

本文的構想，最早來自於我參加井上章一教授主持的「性慾的社會史」共同研究（京都：國際日本研究中心，2010-2012）。在持續三年的研究會上，井上章一、劉建輝、齊藤光、古川誠、梅川純代諸氏給予的賜教尤多。文中的部分內容，曾分別在精華大學（京都）和新潟大學、以及日文研的市民講座「日文研フォーラム」上作過口頭報告，分別得到申昌浩、武藤秀太郎、錦仁、佐野眞由子諸氏不少有益的建議。在「日文研フォーラム」上的演講記錄，後由日文研印刷成冊，即「『吾妻鏡』の謎　清朝に渡った明治の性科学」（2014 年）。另外，2012 年 7 月承蒙黃克武所長給予中研院近史所的來訪學人資格，使我得以接觸到台灣豐富的學術資源，同時還有機會得以向彭小妍教授當面求教。如果沒有張仲民、武田雅哉、潘光哲三位的無私餽贈，則本文的中文文獻無疑將大爲遜色。在此謹向上述諸位以及提出中肯批評意見的匿名評審者表示感謝。文中所有表述如有不妥之處，責任均在作者本人。本文能最終完成，還得益於作者在井上章一教授指導下擔任外國人研究員期間(2013.9-2014.8)，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卓越研究環境。此文亦是我在日文研圖書室的苦鬥紀念。

2015 年 7 月 23 日識，時在九州大學伊都校區。

徵引書目

一、中文史料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3。

《清議報》。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王韜，《璇閨祕戲方》手稿，收入《苕華廬日記》，冊 2。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檔名：wt-c-08.doc。

本刊資料室，〈兩性醫學講座（節錄美國霍立克著生殖器學）〉，《香雪海》（上海出版社編，革新第 17 期），1947 年 6 月 10 日。

光旦，〈《新文化》與假科學——駁張競生〉，《性雜誌》，期 2，1927，頁 1-8。

合信，《全體新論》。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越智藏版，1857。

合信，《博物新編》。東京：老皀館，1874。

李伯元著，熊飛校勘，《文明小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李伯元著，薛正興校點，〈南亭四話〉，收入《李伯元全集 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周作人著，鐘叔河編，《上下身：性學．兒童．婦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周作人著文，鐘叔河編訂，《知堂書話》，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松本安子著，誘民子譯，《男女婚姻衛生學：一名少年男女須知》，橫浜：啓智書会，1902。
法烏羅著，誘民子譯，《男女秘密種子奇方》。上海：國明書局印行。該書扉頁則題「生育指南房中術　振華小說社印行」，出版時間不詳。
法烏羅著，誘民子譯，《男女衛生交歡論》（扉頁題《男女愛情合歡新論》）。出版地及初版時間不詳。
法烏羅著，憂亞子譯，《男女交合秘要新論》（封面題《男女新法衛生秘要新論》，上海圖書館藏）。上海：文益書局總發行，1914。
花立克原著，伊沢德譯述，姚昶復譯，《生殖器之研究》，上、下冊。衛生研究社，宣統元年刊。
建人（周建人），〈電氣生理學與生殖〉，《東方雜誌》，卷19號1，1922，頁109-112。
柯爲良，《全體闡微》。福州聖教醫館，光緒七年(1882)。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1902，收入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康有爲著，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爲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康有爲著，樓宇烈整理，《康有爲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
張競生，〈一個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優種社」同人啓事〉，《京報副刊》（北京），號375，1926年1月5日，頁14-15。
張競生，〈介紹一個大問題——男女關係〉，《京報副刊》（北京），號375，1926年1月5日，頁9-10。

張競生，〈第三種水與卵珠及生機的電和優種的關係。又名：美的性欲〉，《新文化》，卷 1 號 2，1927 年 2 月，頁 23-48。
張競生，《美的人生觀》。初版 1925 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張競生編著，《性史 1926》。臺北：大辣出版公司，2005。
森田峻太郎纂，《傳種改良問答》。上海：商務印書館，1901。
楊翥，《吾妻鏡》。杭州圖書公司，光緒二十七年(1901)自序。又，該書的校對排印版，收入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附錄五，頁 360-371。
葉德輝編，《雙梅景闇叢書》。東京：出版科學綜合研究所影印，1977。
蔡元培，〈夫婦公約〉，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卷 1。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霍立克著，仇光裕・王建善譯，《生殖器新書》。上海：日新書所，1902。
霍克立，《男女之秘密》。中國衛生研究會，1922，第 4 版。
瀚，〈嗚呼！張競生的卵珠〉，《性雜誌》，期 1，1927，頁 1-3。影印版收入《民國珍稀短刊斷刊上海卷 58》。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印中心，2006，頁 28751-28753。
藤根常吉著，丁福同譯，《婚姻進化新論》。上海：文明書局，1903。
譚嗣同著，印永清評註，《仁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二、日文史料

ホリック著，守矢親國譯，《生殖器新書　全　一名　既婚未婚男

女必讀婚姻案内》。東京：博文館，1897。
内務省警保局，《自明治二十一年至昭和九年禁止単行本目録》，收入《発禁本関係資料集成》。東京：湖北社復刻，1977。
水城學人校閱，武藤忠夫著述，《男女自衛造化機新論》。東京：嵩山堂，1895。
米國哈爾保耳內原撰，日本長谷川竹葉抄譯，《通俗生殖器論》，1878。
斉藤光編，《性と生殖の人権問題資料集成》，卷 27《性科學・性教育編 1，一八七五～一九〇五》。東京：不二出版，2000。
斉藤光解說，《近代日本のセクシュアリティ　第一巻　通俗性欲学以前》。東京：ゆまに書房，2006。
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事務所編，《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　書籍總目錄》，1893。復刻版收入明治文獻資料刊行會編，《明治前期書目集成（補巻の四）》。東京：明治文献，1975。
東都愛情散史校閱，浪華艷情笑史著，《男女交合無上之快樂》。大阪：梶尾商会，1898。
松本安子，《男女生殖健全法》。東京：中央看護婦会，1900。
高木敦叔敵，《全體新論譯解》。大阪：文榮堂・寶文軒，1874。
細野順纂譯，《男女交合造化機新論》。東京：聚榮堂，1888。
發烏羅（フアゥラー）著，橋爪貫一抄譯，《男女交合新論》。東京：春陽堂，1888，第 5 版。
福田純子編，《我樂多珍報》。東京：柏書房復刻，2008。
綿貫輿三郎編著，《延壽得子　婦人と男子の衛生》。東京：上海新智社東京分局，1905。
廣瀨元周，《婦嬰新説和解》。京都：石田忠兵衛，1874。

藤根常吉纂譯，《生殖衛生論　全》。東京：吐鳳堂書店，1899。

三、西文史料

Bartholin, Thomas. *Thomæ Bartholini, Anatome ex omnium veterum recentiorumque observationibus*, 1673; 國際日本文化中心野間文庫藏。

Bauhin, Caspar. *Caspari Bauhini Basileensis Theatrum anatomicum*. Francofurtiat Moenum: Typis Matthæi Beckeri, 1605.

James Ashton, *The Book of Nature.* New York: Wallis & Ashton, 1861.

Saunders John B. de C.M., and Francis R. Lee. *The Manchu Anatomy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康熙硃批臟腑圖考釋）。Taipei: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1981.

四、專書和論文（中文）

牛亞華，〈《泰西人身說概論》與《人身圖說》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卷 25 期 1，2006，頁 50-65。

李貞德，〈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收入祝平一主編，《衛生與醫療》（第四界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年 11 月，頁 101-155。

李銀河，《新中國性話語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

沙培德(Peter Zarrow)、張哲嘉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范行準著，牛亞華校註，《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夏曉虹，《晚清的魅力》。天津：百花出版社，2001。
高晞，《德貞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張仲民，〈另類的論述——楊翥《吾妻鏡》簡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5，2007 年 12 月，頁 195-210。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
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慾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頁 77-96。
彭小妍，〈性啓蒙與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張競生與五四的色慾小說〉，《文藝理論研究》，1995 年第 4 期，頁 46-53。
彭小妍，〈張競生的《性史》：色情還是性學？〉，《讀書》，2005 年第 8 期，頁 156-161。
彭小妍，〈張競生的性美學烏托邦：情感教育與女性治國〉，收入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561-587。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下冊，1988 年 12 月，頁 141-194。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實藤惠秀監修，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第 2 版。

劉達臨，《二十世紀中國性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00。

讓・斯丹熱(Jean Stengers)、安娜・凡・內克(Anne Van Neck)合著，巫靜譯，《自慰：一種巨大恐懼的歷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9。

五、專書和論文（日文）

アラン・コルバン(Alain Cobbin)，〈新婚夫婦の小聖書〉，收入デュビー、コルバン、アリエスほか著，福井憲彦・松本雅弘譯，《愛と結婚とセクシュアリテの歴史　增補・愛とセクシュアリテの歴史》。東京：新曜社，1993。

上野千鶴子，〈解説〉，收入小木新造、熊倉功夫、上野千鶴子校注，《風俗　性》。東京：岩波書店，1990。

土屋英明，〈中國の性愛文獻　百六十三〉，《東方》（東京），号 357，2010 年 3 月，頁 22-23。

木本至，《オナニーと日本人》。東京：インタナル株式会社出版部，1976。

王宝平，〈中国における『吾妻鏡』の流布と伝播〉，《古文書研究》，号 55，2002，頁 77-87。

王宝平，〈康有爲『日本書目誌』出典考〉，《汲古》，号 57，2010 年 6 月，頁 13-29。

石川一孝，《明治造化機論年表》。観音寺市：丸三書房，2013。

吉田寅，〈中国キリスト教初期医療伝道史研究——ホブソン著中国

語医学書の一考察——〉，《立正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号 12，1996 年 3 月，頁 63-114。

作者不明，《色香歌》，收入古典研究會編，長澤規矩也解題，《唐人辭書類集》，第 4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1。

赤川学，《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歴史社会学》。東京：勁草書房，1999。

赤川学，《明治の「性典」を作った男　謎の医学者・千葉繁を追う》。東京：筑摩書房，2014。

松本秀士，〈清末刊行の中国文人体解剖学書について〉，《日本医史雜誌》，第 53 巻 4 号，2007，頁 545-568。

斉藤光，〈「性欲」記号・概念の誕生に関する新たな知見〉、《京都精華大学紀要》，号 36，2010 年 2 月，頁 73-85。

斉藤光，〈「性慾」の文化的標準化〉，《京都精華大学紀要》，号 6，1994 年 1 月，頁 161-176。

武田雅哉，《桃源郷の機械学》。東京：作品社，1995。

唐権，《吾妻鏡の謎　清朝へ渡った明治の性科学》。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4。

高西賢正，《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上海：東本願寺上海別院，1937。

深澤一幸，〈葉德輝の「双梅景闇叢書」をめぐって〉，《言語文化研究》，号 38，2012 年 3 月，頁 67-91。

渡辺純成，〈満州語医学書『格体全録』について〉，《満族史研究》，号 4，2005 年 6 月，頁 22-113。

Mann, Susan 著，小浜正子・Linda Grove 監譯，《性からよむ中国史——男女・隔離纏足・同性愛》(*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東京：平凡社，2015。

Stolberg, Michael 著，斉藤光譯，〈自瀆道德改良性病商売——『オ

ナニア』(1716)の諸源泉とその歷史的文脈に関する考察(上)〉，收入井上章一編，《性欲の研究　エロティック・アジア》。東京：平凡社，2013。

六、網路資料

孔夫子舊書網：www.kongfz.com，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5 日。

The Teachings of the Bedchamber in Imperial China: On Popular Sexology Imported from Meiji Japan

Tang Quan*

Abstract

I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 history, sexology, as a new knowledge necessary to enlighten citizens and the society, was warmly welcom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ks introducing sexual knowledge kept coming up, bringing a surge of such publications that lasted several years. This paper studies relevant publica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rough seek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such knowledge as well as examining specific texts, discusses the features of the sexual knowledge system assimilated by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 named as "popular sexology" in this paper. On the other hand, in analyzing the variety of discourse centering on such sexual knowledge, i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sexology o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is paper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it examines the sexual knowledge in works of anatomy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ritten by the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One point that is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here is that, even though such knowledge had little impact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it triggered great response in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the neighboring Japan. In the second part, the paper focuses on Japan during the Meiji Reform, and discusses the Zōkaki-ron popular at that time, which is also the origin of the popular sexology in China. Besides introducing Chiba Shigeru's translation of *Zōkaki-ron*, it examines such perspectives particular to the Zōkaki-ron as theories of sexual passion and electricity, as well as the diverse discourse centering on the Zōkaki-ron. In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Zōkaki-ron to the Chinese society. Under such slogan as "better child birth and rearing to secure a stronger nation", the Zōkaki-ron was mistakenly seen as the fundamental of physics and psychics, and introduced to China mixed with other educational work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versions of books introducing the Zōkaki-ron, which include the Japanese version,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edition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and the compilation done by the Chine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eatures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works, such as *Nannü Jiaohe xinlun* (A new theory on sexual intercourse. An adaptation from the original by O. S. Fowler) and Morita Syuntarō's *Chuan Zhong Gai Liang Wen Da* (FAQ on Giving Better Birth). In the fourth part, the paper focuses on a particular perspective in popular sexology—the theory of electricity, and examines it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Not only was it widely accep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s influence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culminated in Zhang Jingsheng's articles in the late 1920s. Popular sexology, once extensively accept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stitutes a par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tha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Key Words: popular sexology, Zōkaki-ron, the theory of electricity